

为何西方在中国之前先富而中国自 1949 年以来迎头赶上西方 ——“大分流”和“大趋同”问题的另一个解释^①

Vladimir Popov^②

内容摘要:这篇论文旨在提供一个非技术层面的关于“大分流”和“大趋同”的解释,纵观各类文献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在此笔者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西方国家通过打破旧体系退出马尔萨斯陷阱,伴随而来的是收入不平等以及预期寿命降低,但是使得以消费为代价的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再分配成为可能。当同样的模式运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殖民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导致的结果是传统体制的毁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以及处在更加糟糕的往前追赶的起跑点上。其它一些东亚、南亚、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受殖民政策的影响较小,所以成功地在 20 世纪末保持了旧体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处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较好的起跑线上。缓慢的技术进步最终使他们找到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的出口——增加收入使得在没有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或者减少预期寿命的情况下,投资占 GDP 份额可以升高。

关键词: 马尔萨斯陷阱 大分流 大趋同 制度 比较

一、引言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表现的根源在于中国文明超常的连续性——世界上最古老的^①国家——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没被打断的传统。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东亚、印度、中东和北非)比起从外国引进先进的制度(拉美、前苏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来说更有益于增长。像 1917 年的俄罗斯那样,中国在西方化尝试失败后于 1949 年恢复集体主义经济。不像俄罗斯在 1991 年以后的情况,中国在 1979-2009 年成功地保持住“亚洲价值观”体系——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然而,从 1985 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的快速扩大可以看成是集体主义制度削弱的信号,这是快速经济增长延续的唯一最重要的威胁。

在所有的经济学历史谜题中,最关键、最有趣的就是“大分歧”,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从 16 世纪就开始出现,至少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开始扩大,20 世纪 30-60 年代的苏联是第一个经历成功的追赶发展并且和西方减少了差距的非西方化的国家,尽管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这种差距停止缩小并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扩大。20 世纪 50-80 年代,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成功追赶上西方并且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相似的进程在东南亚和中国发生。加上最近印度以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加速增长,这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一个大分流的顶峰。从现在开始,世界会逐渐经历全球收入水平大趋同。

这篇论文旨在提供一个非技术层面的关于“大分流”和“大趋同”的解释,纵观各类文献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在此笔者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西方国家通过打破旧体系退出马尔萨斯陷阱,伴随而来的是收入更加不平等以及预期寿命降低,但是使得以消费为代价的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再分配成为可能。当同样的模式运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有殖民政策的拉丁美洲、前苏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导致的结果是传统体制的毁灭,收入不平等问

^① 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是在 7 月 9-10 号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难以捉摸的平衡:区域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座谈会上,非常感谢 Perry Anderson, Jack Goldstone, Osamu Saito, Yoshikazu Suzuki, Harry Wu 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② Vladimir Popov, 莫斯科新经济学院, 电子邮箱: vpopov@nes.ru。

的加剧以及赶超发展的起始劣势。其它一些东亚、印度、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受殖民政策的影响较小，所以成功地保持了旧体制，从而使得他们自己处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较好的起跑线上。缓慢的技术进步最终使他们找到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的出口——增加收入使得在没有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或者减少预期寿命的情况下，投资占 GDP 份额可以升高。

二、西方国家如何致富：文献综述

在公元 1500 年以前，所有国家的人均 GDP 大致相同（以 1985 年的物价计算大约为 500 美元，Maddison, 1995），但是到 1900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增加到了 6:1，尽管在 20 世纪的后半页，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成功地加入“富人俱乐部”；其它一些国家（东南亚、中国、和近期的印度）成功地大幅度缩小了和富裕国家的差距；还有其它一些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欧和前苏联）落后或者未能减少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图 1，图 2）但到 2000 年，这一差距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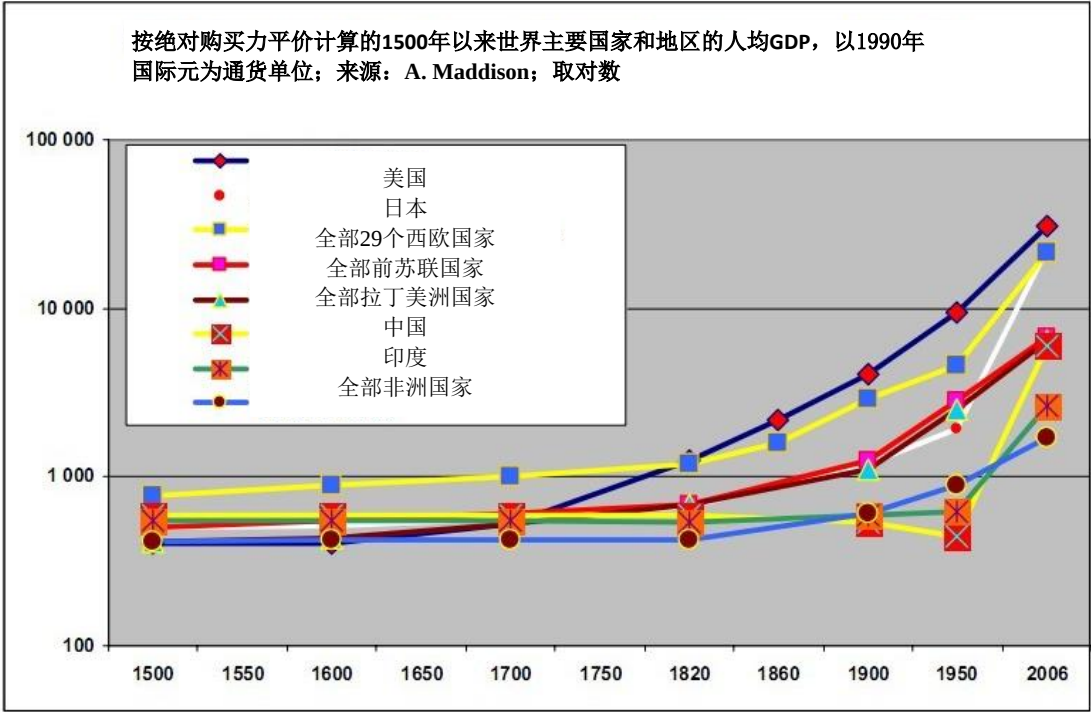


图 1 按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500 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以国际元为通货单位
来源: Maddison, 2008.

在经济历史中关于国家财富性质和最古老并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加富裕，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①，一种强调历史进步的进化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另一种则首要关注一些大事的巧合和运气的作用，将发展的成功或者失败归因于既存的地理条件或历史事件。

^① 争论在 Bryant（2006 年）的文献中有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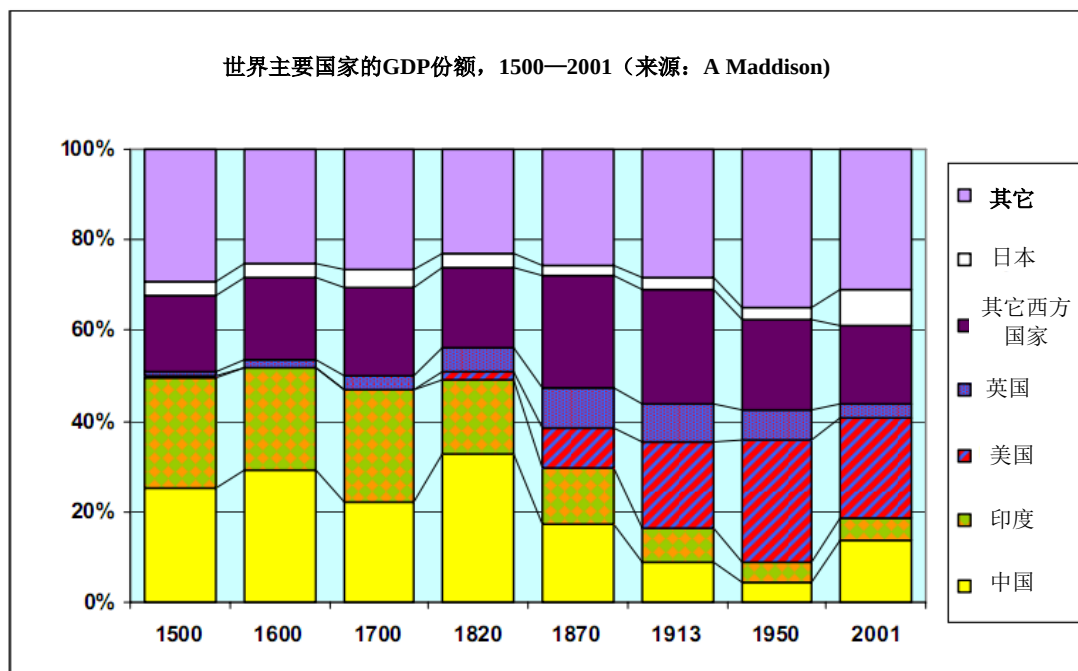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国家在以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 GDP 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Maddison, 2008.

根据第一进化学派（代表人物为 Landes, 1998; Mokyr, 2002, 只列举了一些当代学者），西方国家 1500-1900 年的增长使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一事实是这段时期社会改变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农奴制的废除和人权的保障，宗教改革和新教价值观，基本宪法，欧洲启蒙运动带来了思想的开放和交流，技术创新最终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加速增长。“传统的智慧被许多经济历史学家认可，最典型的是 Douglass North，他指出了一系列连贯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必须的，或者说至少是有益的。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本身，可靠的财产权、相对自由的市场和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性。这些因素能够减少储蓄、投资和企业活动等的不确定性，通过使人们投入到经济活动而不是暴力和祷告来加强其激励作用。当这些背景条件前所未有的得到满足后，工业革命就因此发生了。英国是背景条件最快并且最充分得到满足的国家”（Solow, 2007）。

另一方面，另一学派质疑由社会力量本身所引起的进化的逻辑性（Dimond, 1997; Pomerantz, 2000; Wong, 1997, 只给出了少数同时期的例子）并且特别关注看似次要的历史事件——幸运或者不幸，但是最次要的是预设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和大洲的发展。例如，Dimond（1997）指出缺乏的野生动物适合在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非洲和澳洲驯化，欧亚大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巨大的有利条件。或者说也许比较性发展的起源能够追溯到欧亚大陆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农业生产率足够高，以便支持高密度的人口——这是技术创新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

Pomerantz (2000)认为即使在 18 世纪，中国技术上也不劣于欧洲，社会结构能够支撑技术创新、大量累计资本等等。根据他的观点，欧洲成功而中国没有成功纯属巧合——煤和铁矿石的大量匮乏彼此关系密切，没有大量的对外迁移（在哥伦布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 15 世纪早期发现马达加斯加岛、合恩角和沙特阿拉伯，明朝皇帝禁止大船的制造，中国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闭关锁国）。Pomerantz 的观点是欧洲的境外集体移民在由马尔

萨斯制度向现代增长制度的过渡中扮演了关键因素^①。19 世纪技术进步加速但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并处在增长之中（0.6%，1820-1870 年）由于人口转型还没有发生，往北美的大规模迁移缓和了稀缺资源和土地的压力，并且避免了收益递减^②。

相似的逻辑，土地稀缺是激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因素。在宋朝，中国在人口达到高峰的同时，由于游牧民族入侵损失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宋朝反而因此经历了一个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更加繁荣的商业和国际贸易、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爆发式增长。然而，中国在宋朝之后大幅度改善人均耕地比率，却发现农业陷阱问题更加严重，城市化水平降低，外国贸易减少，人力资源减少，技术进步停滞(Wen, 2008,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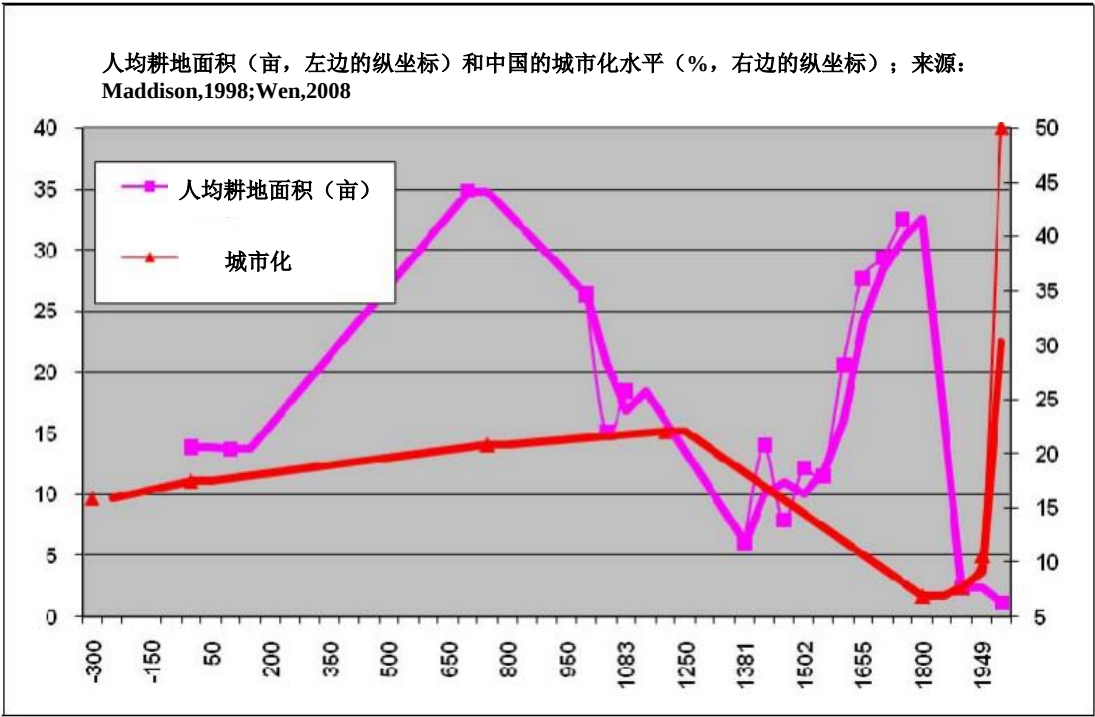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亩，左边的纵坐标）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右边的坐标）
来源：Maddison,1998;Wen,2008.

尽管把这个理论推广到国际间的比较会更加困难：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在欧洲并没有那么稀缺，更不用提澳大利亚和北美了（图 4），这两个地方的城市化水平在几百年以前就超过日本、中国和印度。

^① 后者的特征是：人口增长吞噬所有由技术改变所带来的潜在的人均收入的增长（Galor and Weil, 2000）。
^② 西方经济成功的另一个更加传统的进化解释（引用自 Pomeranz, 2000）同样认为移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欧洲早期农奴制的解除使得自由劳动力更加昂贵，这刺激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大量的前往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移民，东半球的劳动力成本不会那么昂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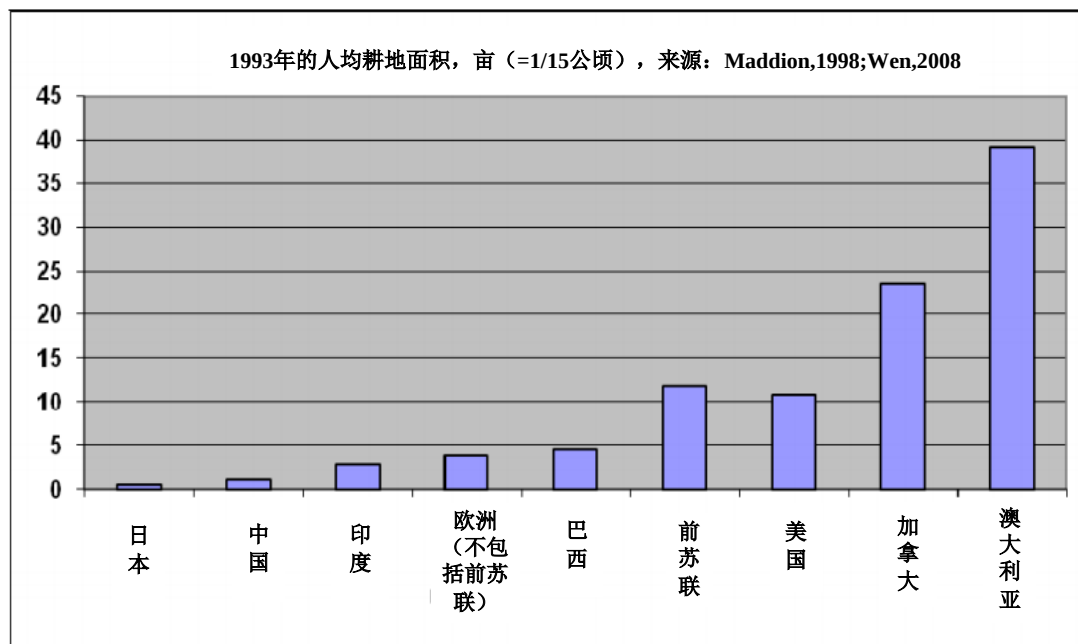


图 4 1993 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亩（1/15 公顷）

来源：Maddion, 1998; Wen, 2008.

不少解释关注于人口发展，Gregory Clark（2007）指出有区别的生育能力（富裕家庭的小孩存活可能性更大）在中世纪的英国比其它地方更加明显，因此受教育阶层在社会上传播知识比其它地方更快。Turchin（2005）提出了一个以精英人群的膨胀（或者过度膨胀）为基础的帝国兴起和衰落的模型。

近几年新数据特别是机构质量的指数出现了，新的数据已经不仅在经济历史学家也在研究宏观和增长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新的讨论。在一篇重要的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中（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作者使用了一个敏锐的指标作为衡量制度变化的工具——19 世纪主要的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地区移居者的死亡率。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死亡率很高（冈比亚、马里、尼日利亚的死亡率比澳大利亚、巴哈马、加拿大、香港、新西兰和美国高数百倍），移居者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好的制度。这篇文献同样表示当地人大部分对于那些会给新到的移民带来致命打击的疾病产生了免疫力，所以移居者的死亡率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仅通过制度的影响来影响经济。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指标能够解决内生性问题（制度=>增长=>制度）并且能够评估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作者总结认为控制住制度的影响后，地理位置对增长没有实质性影响。

然而，其他作者则坚持认为地理位置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不仅有间接影响，还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在一系列的论文中，Sachs 和 Warner（1995, 1997a, b, 1999）和 Sachs（1996）认为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不同作用机制有相反的效果——过分高估实际汇率（荷兰病）和对于机构质量的腐败的影响。Sachs and Warner（2001）表明“基本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被忽略的地理或者气候变量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没有被观察到的增长威胁导致结果有偏。资源富裕的国家倾向于成为高价经济体，也许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错过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Sachs（2003）和 Faye, McArthur, Sachs 和 Snow（2004）这两篇文章也提出了许多衡量地理位置的直接影响的变量——是否临海（内陆国家），运输成本，天气和疾病。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2001），Sachs（2003）的文献指出英国战士 1820 年左右在世界各地的死亡率和 1990 年人均 GNP 的水平的高度相关性这一事实，它可以由疟疾在阻碍长期经济发展方面的

直接有害影响来解释。“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的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疾病大幅度减少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并且增加了国际贸易、移民和去患疟疾地区旅游的的交易成本”这一事实,“这就像是声明称近期香港特别行政区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能用由该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来衡量,而不是由它给香港和亚洲地区之间旅游业所带来的破坏进行衡量”(Sachs, 2003)。

他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本质上形成了三类发展中国家:(1) 制度、政策和地理都是有利的国家(东亚的沿海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韩国的全部、中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 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和制度相对较差的国家(中欧地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些国家比邻西欧基本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3) 地理位置不利的穷困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和美国中部的高山地区,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失败,而且这些地区往往都是收入水平很低,人口很少(因此国内市场较小)并且远离海岸线居住。这里的人民被疾病困扰,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Sachs (2003) 强调第三类国家基本上陷入了贫穷,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吸引私人资本流入来满足市场的考验。

一个相反的观点由 Rodrik, 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2) 在一篇题为“制度规则”的文章中提出。作者考察了三个基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理(由到赤道的距离和一个局部的二元变量来衡量), 贸易开放度(贸易占 GDP 的比重) 和制度。难点在于这三个因素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并且制度和贸易开放度不仅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也依赖经济增长本身。为了合理地估计每个因素的贡献度, 他们参考 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 的文献, 用移居者的死亡率来度量制度因素的影响, 用预测的贸易份额来度量贸易占 GDP 的比重(来自引力模型)。在给予地理变量、制度变量和贸易开放度变量同样的权重之后, 他们发现制度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制度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 反过来制度又决定贸易开放度和增长。地理因素对于增长的直接影响(除去通过制度进行影响的部分) 是不显著的。

这种方法和直接的地理决定论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和 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 文献中的方法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Rodrik, 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2) 认为地理因素, 特别是移居者的死亡率是制度质量的一个很好的预判性指标。但是地理因素并不是死亡率的主要起因。制度的起源是一个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复杂的进程, 找到一个合理的计量工具和找到合理的解释是不同的。Rodrik (2004) 用下面的例子来解释了这种区别: 人均 GDP 的差异在非殖民地国家中并不比殖民地国家中小——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在范围的一段, 日本在范围的另一端, 土耳其和泰国在中间的某一位置。世界上没有殖民历史的国家间制度质量的差异由什么来解释呢?

三、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比较(制度延续性和移植外来制度的比较)

关于殖民地和非殖民地国家制度起源的另一个解释是制度的连续性。所有的国家在过去都有传统的社会结构; 在改革之前, 在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下, 当地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亚洲价值观”——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马尔萨斯增长陷阱是因不能调动低收入人群的储蓄产生的。缺少储蓄或投资使得资本劳动比率($K/L=k$) 不能提高, 这是因为当时人口增长速率很高, 所有的投资都被用来为新加入的劳动力创造工作, 没有投资用来增加 k 。并且, 人口增长速率依赖 y 、生产率(雇佣者的人均产出), 因此当技术进步 A 带来 y 增加时, 人口增长速率 n 的增加就会吞噬掉所有由于 A 提高带来的 y 的增加。

在索洛增长模型, 劳动力生产率因技术进步 A 和资本劳动比率 $k=K/L$ 增加而增加:

$$y = A * k^{\alpha}$$

为新加入的劳动者创造工作和替代资本存量中的折旧部分（ d 表示资本存量中的年折旧率），对每个雇佣者的必要投资(I_n)为：

$$I_n = k(n + d)$$

每个雇佣者的实际投资等于储蓄率 s 乘以每个雇佣者的产出 y ：

$$I_a = s * y = s * A * k^\alpha$$

均衡状态出现在 E 点，必要投资 I_n 和实际投资 I_a 相等（如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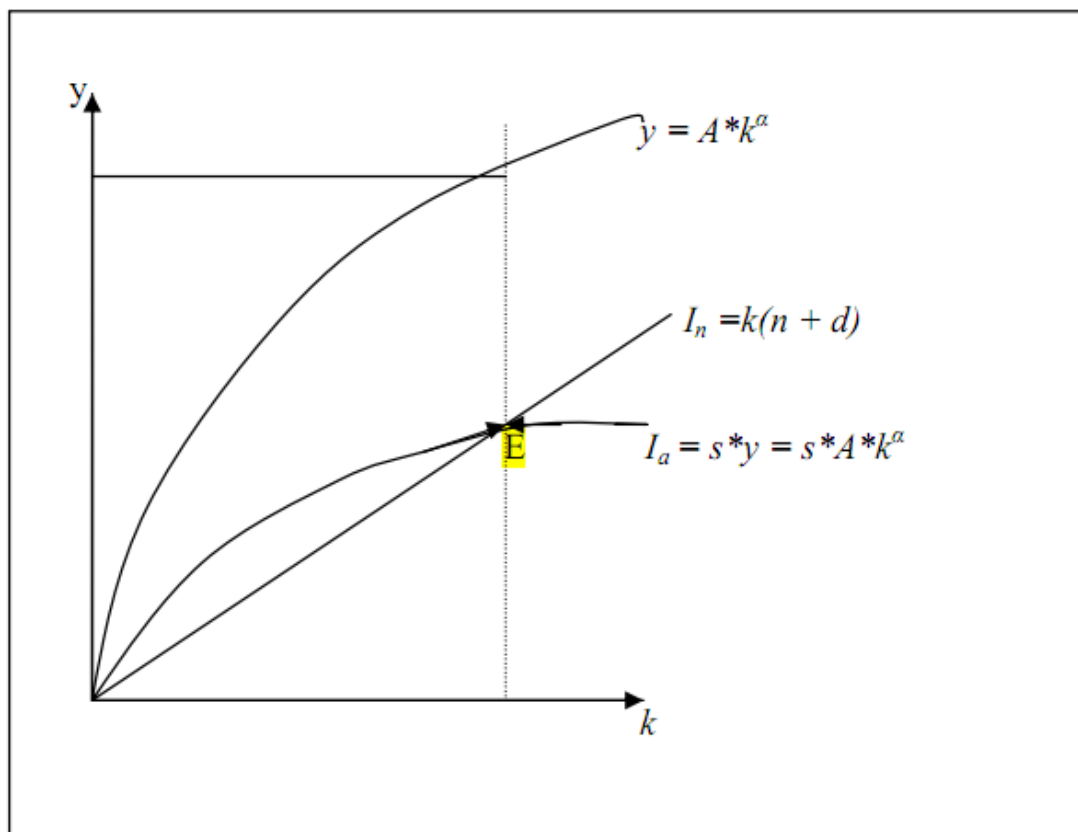


图 A 固定人口增长率下的索洛模型均衡

然而，如果人口增长速率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生产率（和人均 GDP）的增加而变化——先加速上升，再减速上升——我们能得到两个均衡：一个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稳定均衡点（差均衡点， E_b .增长陷阱）另一个在高收入水平上的不稳定均衡点（好均衡点， E_g .如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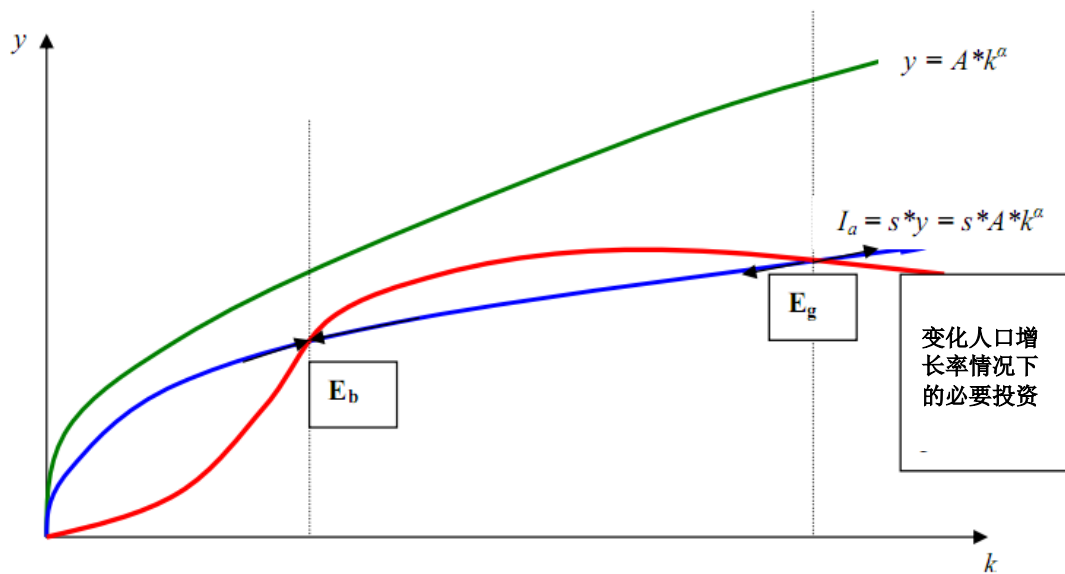


图 B 索洛模型中的马尔萨斯陷阱（变化的人口增长率）

在由马尔萨斯增长体系过渡到现代工业增长体系之前，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坏均衡点 E_b 上，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 GDP 的增加会被上升的人口增长速率迅速抵消，人均收入下降。各国的生产率大致相同并且基于人口进行竞争：一个国家的力量是由国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以及万一发生战争能够调动的士兵数量所决定的。技术上的进步带来的是人口的增长（就像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加。

人口增长和人均 GDP 的增长之间是明显的负向关系（图 5）；实际上，这是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得出的最稳健的关系之一。对于该关系的解释是将更多的储蓄或投资用来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创造工作，这使得用于 K/L 增加的投资变少从而抑制了生产率提高。人均 GDP 对于人口增长速率的动态影响也是消极的——在马尔萨斯增长体系中，在伴随工业革命的人口转型之前，在那本书的第一版中，马尔萨斯提到收入越低死亡率越高。但是在后来的版本中，他强调收入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近期在统计前期人口动态学的重建方面去的的进步，特别是从教区记录处得到的关于英国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一些数据，给这种关系增加了新的论据（Saito, 1996）。^①

^① 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减小并不是因为死亡率的增加（所谓的积极抑制），而是因为较低的生育能力（预防抑制）。死亡率和真实工资变动没有联系，但出生率 and 真实工资之间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结婚年龄的变化（Saito, 1996，参阅 Wringley 和 Schofield, 1981）：处在经济苦难时期，单身和结婚年龄的推迟导致了较低的出生率，此外，一系列机制引起了饥荒时期生育能力的下降。“历史上或者近代的饥荒不仅仅饿死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饥荒减少了怀孕的数量”（Saito,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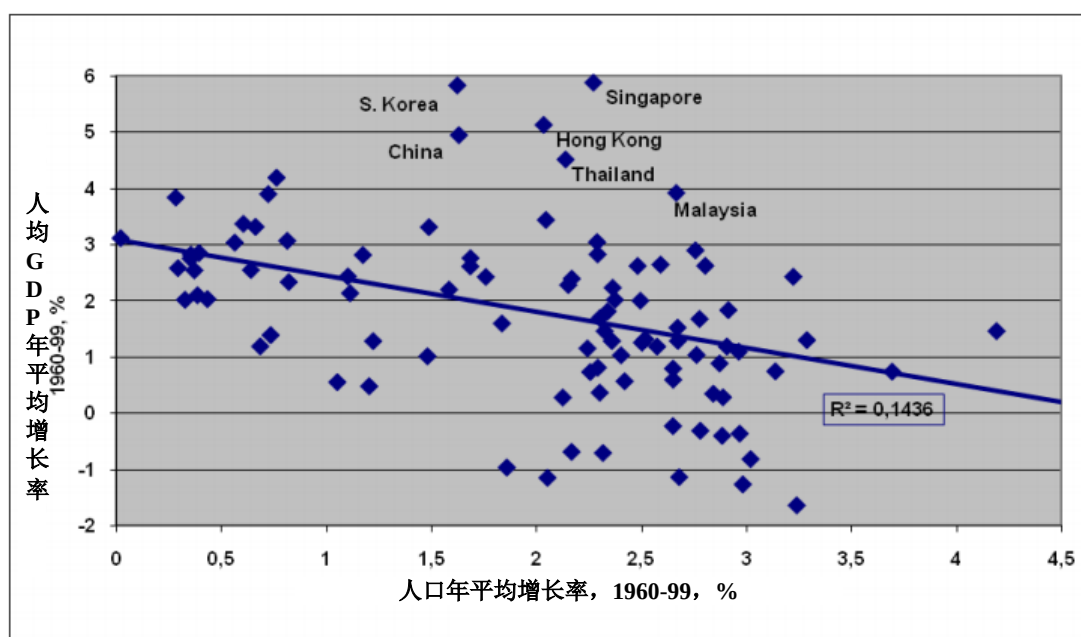


图 5 1960-1999 年人口和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 %

来源: WDI.

试图打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恶性循环的尝试不止一次 (Greece, Rome, Byzantium), 但是所有的尝试都以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失利而告终。那些想要消除集体主义制度并将个人利益摆在集体利益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收入增长和财富不平等。这带来了储蓄和投资增加, 但以社会两极化、对保持朝代军事实力非常必要的人口增长遭到破坏为代价。当收入水平大约为人均 500 美元时 (以 1985 年美元计算), 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使过多的人处在生存最低保障线以下并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这样的低收入水平的实验本可以偶然地取得很大程度上的成功—两到三个世纪的深入人心的社会重组 (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 没有带来弱势阶层的起义和外国征服。这种机会只有在 16-19 世纪欧洲的西北部得以实现了。

西方是第一个在没有被拥有集体主义制度的邻国攻占的情况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神圣化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和死亡率的增加, 同时投资, 储蓄和 K/L 比率都增加, 这就克服了二维马尔萨斯世界的限制 (更多的人口 $\Rightarrow$ 更多的 GDP)^①。英国的数据表明在 16 和 19 世纪间向现代工业增长的过渡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配套的政策和工业革命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死亡率的增加和制度的削弱。

尽管英国在 1500-1800 年期间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步加快 (每年 0.2%, 因此英国的人均 GDP 在三个世纪期间翻了一倍多^②), 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唯一重要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 1830 年以前的任何会社中工人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有显著性的提高” (Goldstone, 2007)。实际上在 1500-1800 年之间实际工资水平有所下降 (Saito, 2009)。这和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 财富聚集在小部分人手中以及日益增加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投资率在工业革命期间从 1760 年的 6% 上升到 1831 年的 12%) 的事实是相符合的。这同样符合中国 18 世纪的生活标准可以和欧洲相比, 甚至超过了欧洲这一事实: 在公共卫生和环境、医药、热量摄取、预期寿命和国内消费方面, 中国和欧洲的水平是相当的 (Pomerantz, 2000)。

^① 索洛模型是一个外生技术增长模型 (A 是事先给定的)。在内生增长模型中, A 取决于资本积累速度 (用于研究开发的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创新奖励), 因此一个较高的投资速度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资本劳动比率 K/L 上升, 也因为技术水平 A 的提高。

^② 英国人均 GDP 持续增加, 以 1990 年的国际元标价: 1500 年是 714 美元, 1600 年是 974 美元, 1700 年是 1250 美元, 1820 年是 1706 美元 (Maddison, 2008)。

欧洲和中国在 1500-1800 年的消费差距没有如此之大，但是在收入不平等，储蓄和投资积累方面差距很大。英国到 1800 年为止，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这一数字是 10%(Pomeranz, 2006)。根据 Brenner 和 Isett (2002, p. 614)，在英国，长三角地区也发现了同样的经济主体——既占有农民又像地主一样通过经济外的手段收取地租——虽然在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但大部分已经消失了。整个经济中主要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佃户——尽管占有了生产资料（工具，动物等等），但是却与经济再生产中的所有生产资料隔离，特别是土地。

财产的再分配（土地）通过农场平均面积的变化有所体现：在英国，农场面积从 13 世纪的 14 英亩增加到 1600-1700 年的 75 英亩左右，直到 1800 年达到 151 英亩。然而在中国，则是从 1400 年的 4 英亩减少到 1650 年的 3.4 英亩，再减少到 1800 年的 2.5 英亩（大长江三角洲——1400 年的 4 英亩减少到 1600 年的 2 英亩，再减少到 1800 年的 1 英亩）。在中国，增加的农村人口被授予土地，这是以现有业主的土地减少为代价的；在英国，农民被剥夺土地成为无产阶级（Brenner 和 Isett, 2002）。英国城市人口的份额从 1600 年的 6% 增加到 1700 年的 13%，再增加到 1800 年的 24%。但是在中国，这一数据从 13 世纪的超过 20% 减少到 18 世纪早期的 5%（Brenner 和 Isett, 2002）。

换种方式，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以及向现代增长政权的过渡在英国和之后的其它西方国家成为可能，并不是那么多的归因于技术进步的加速或者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加快。过渡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集体主义制度的消除，这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使得储蓄和投资水平能够达到物质资本的积累开始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水平，所以资本劳动比率开始上升。这种过渡的成本是很高的——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削弱制度的能力（高的谋杀率），这些导致在 1560-1730 年的预期寿命从大约 35-40 岁下降到 30-35 岁（图 6）。英国的年度平均人口增长率从 1000-1500 年的 0.7% 下降到 16 世纪的 0.4%，17 世纪只有 0.3%，到了 18 世纪上升到 0.9%，19 世纪这一比率为 0.8%。29 个西欧国家各自的数据是：0.8%、0.3%、0.1%、0.5% 和 0.7% (Maddison,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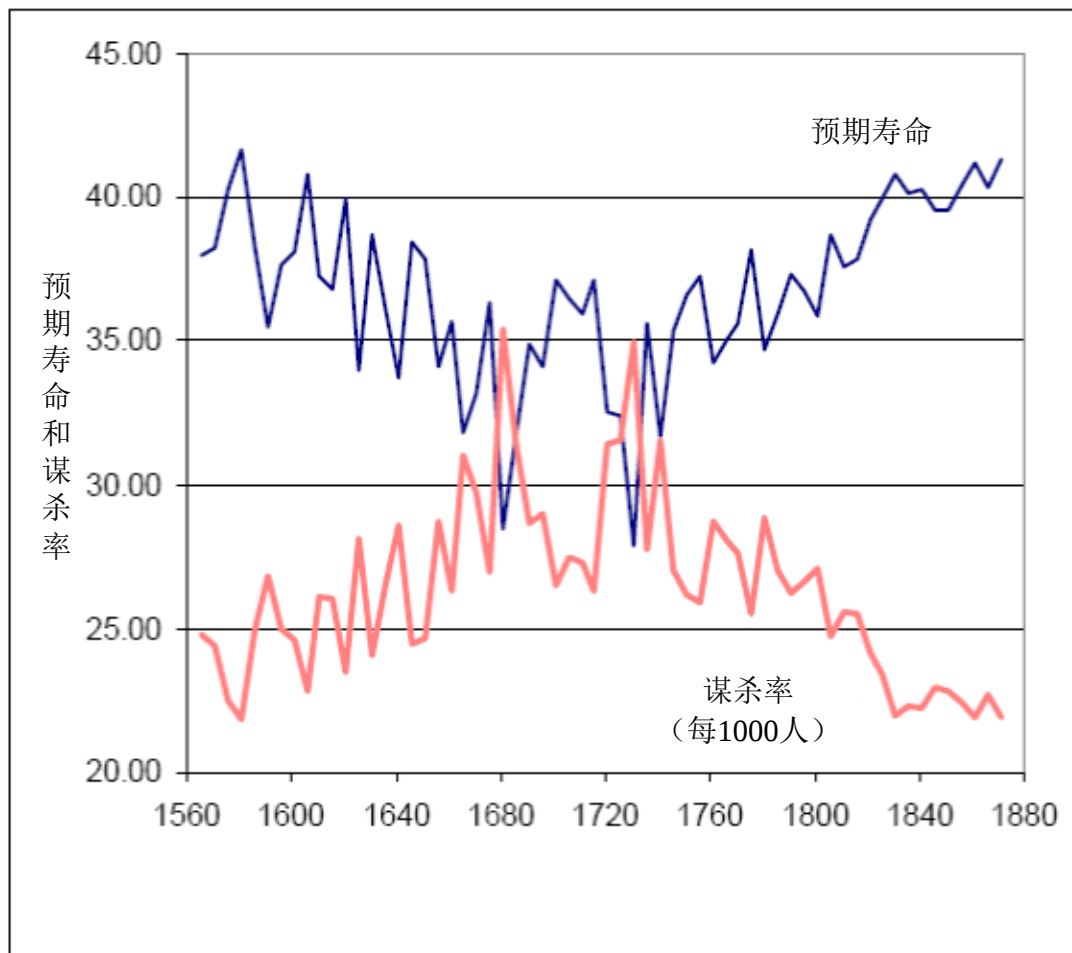


图6 早期城市化期间的谋杀率和预期寿命：英国 1540-1870

来源：Galor and Moav, 2005, citing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大部分先进地区，例如中国，停留在一条不同的发展轨道上——保留了“亚洲价值观”维持 GDP 和人口的缓慢同步增长。我们现在只能推测这种不同的发展轨道的结果，这一轨道中人口规模是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西方的殖民扩张打乱了这种轨道的逻辑演进。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的完全殖民地化和南亚的较小程度的殖民地化，导致了完全或者近乎完全的传统（社区）结构的毁灭，而这些传统结构只有部分被新的西方模式的制度所取代。在广大的地理区域中，只有东亚、中东和北非以及部分南亚地区在殖民化后成功地保持了传统的社区制度。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在被殖民地化和强烈灌输西方价值观的艰难时期仍然保留住了传统的制度的国家，它们和那些传统结构被打乱了的不那么幸运的世界外围地区相比，保留了一个更好的赶超发展的机会。制度的移植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它只有在根据当地传统进行适当调整以便不破坏制度延续性的情况下，才能够良好运行(Polterovich, 2001)。不然的话，他要么会导致当地结构的完全消失（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么会导致对于经济增长不是特别有益的新旧制度的不恰当的混合（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如果一个国家制度的能力是指政府实施规章制度的能力，那么一个自然的测量指标就是谋杀率。犯罪在不同国家的登记方式不同——发达国家高犯罪率是因为在发达国家犯罪能够更好地被记录。但严重罪行例如谋杀，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记录得相当准确。所以谋杀率的国际间比较能够很好地反映问题。

将每 100,000 个居民的谋杀率从 100 个降到仅有 1-3 个花了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时间（图 7）。即使在 17 世纪，西欧地区每 100,000 个居民中的谋杀率总体也超过了 10 个——这比在今天有相似的人均 GDP 水平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实际上，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发现两种主要的模式——一种是在东欧、中国、中东和北非国家谋杀率很低（每 100,000 个居民中有 1-3 个）（图 8），一种是在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图 9）谋杀率很高（每 100,000 个居民中有 15-75 个）。印度（5.5 个）和东南亚国家（大约 10 个，除去菲律宾，在菲律宾这一比率是 21 个）处在两者之间。争论在于保持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东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和印度）能够保持地区的制度能力，而那些消除了这些制度仅仅以个人责任系统加以部分取代的国家（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机构能力下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东欧地区（除了前苏联）是这个规律中的例外：它经历了制度能力很低的时期——15-17 世纪的高谋杀率，这一点和西欧类似（尽管缺少直接的证据——图 7 中的所有观测数据都是来自西欧——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意大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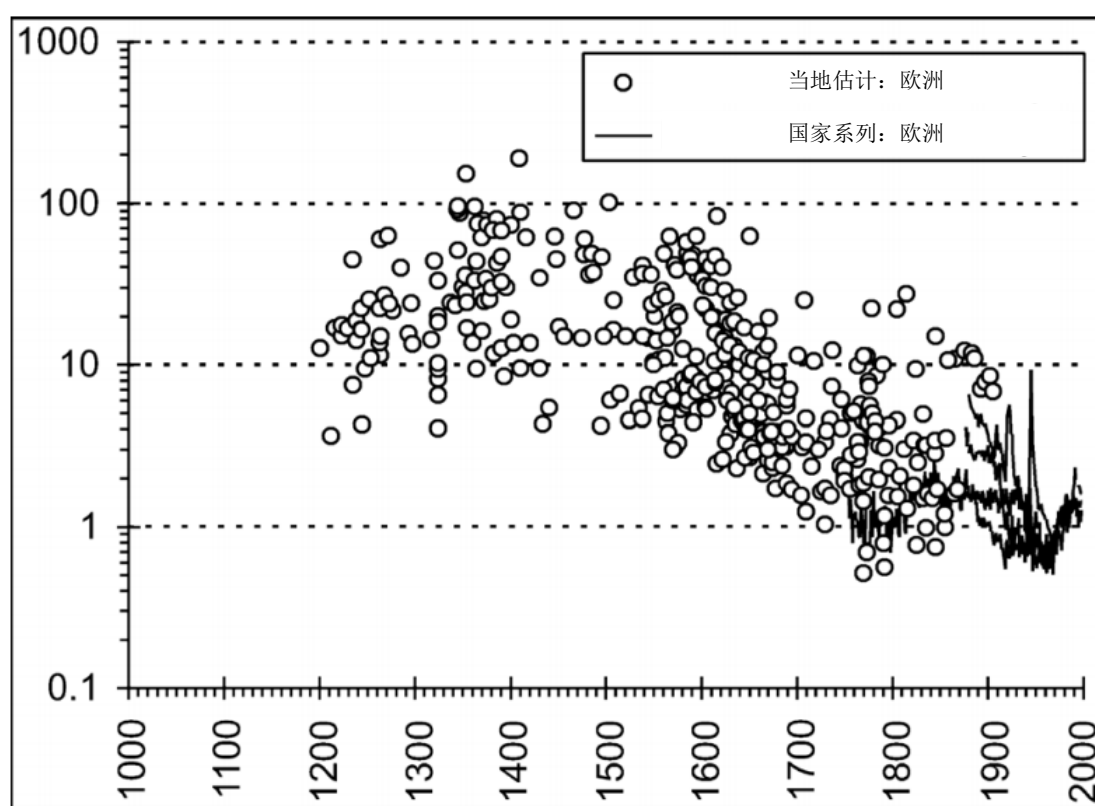


图 7 欧洲每 100,000 个居民的长期谋杀率

来源：Eisner, 2003。^②

另一个关于制度延续性崩溃成本的证据来自前现代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公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第一次发生在 16-19 世纪的西方国家，并且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得数据（Milanovic, Lidert, and Williamson, 2008）表明在 18 世纪的英国、荷兰和西班牙，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 0.5 甚至 0.6 的水平（图表 10a）^③。相对于今天的标准来说是很高的

^① 东亚、南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另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在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城市贫民窟（Pomeranz, 2006）和无家可归的孩子，而这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是大量存在的。

^② 关于谋杀率总体趋势的所有前现代局部估计和四个国家的总体估计：所有 398 个局部估计数据来自于历史凶杀案数据库；国家估计是指的瑞典、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士、意大利。

^③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基尼系数从 1688 年的 0.4 升高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 0.53（Saito, 2009）。

水平。照以前的水平相比，也是很高的水平（1 世纪的罗马和 11 世纪的拜占庭的基尼系数都是 0.4—图 10a）^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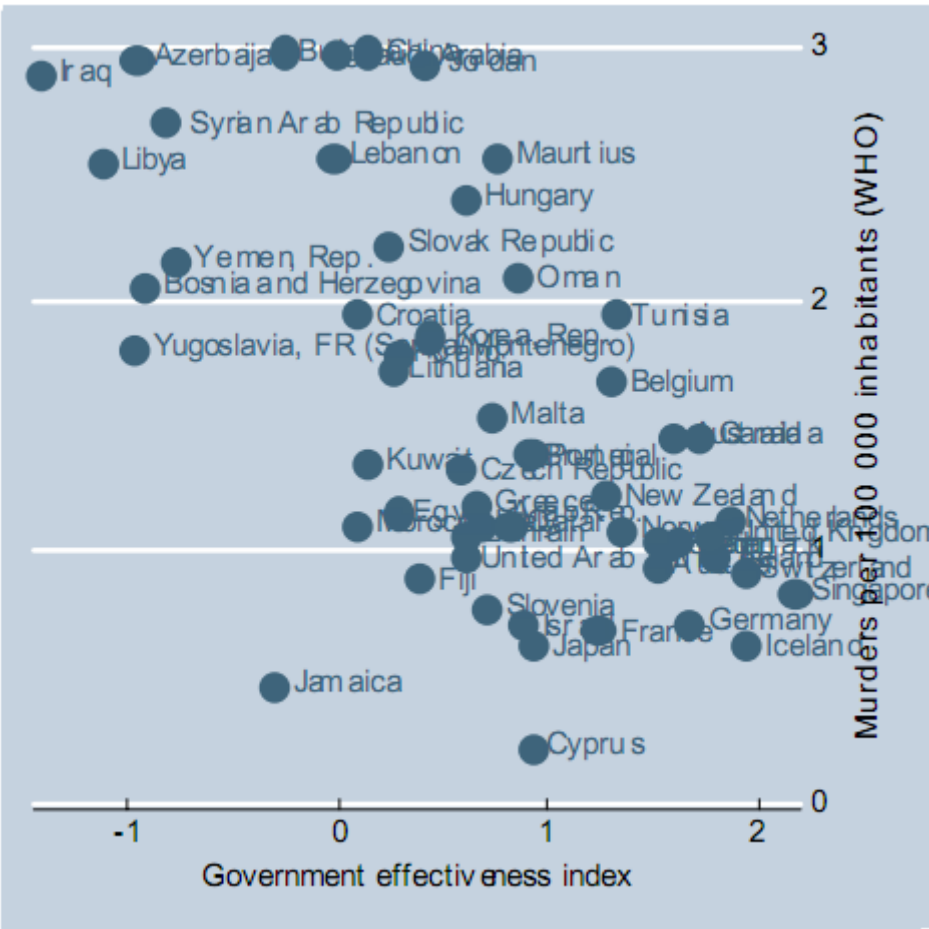


图 8 每 10 万居民中的谋杀者以及 2002 个国家政府效率指标

来源：World Bank; WHO.

^① 低收入国家收入严重不平等意味着许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极度贫困当中，并且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生存线以下这就导致了高谋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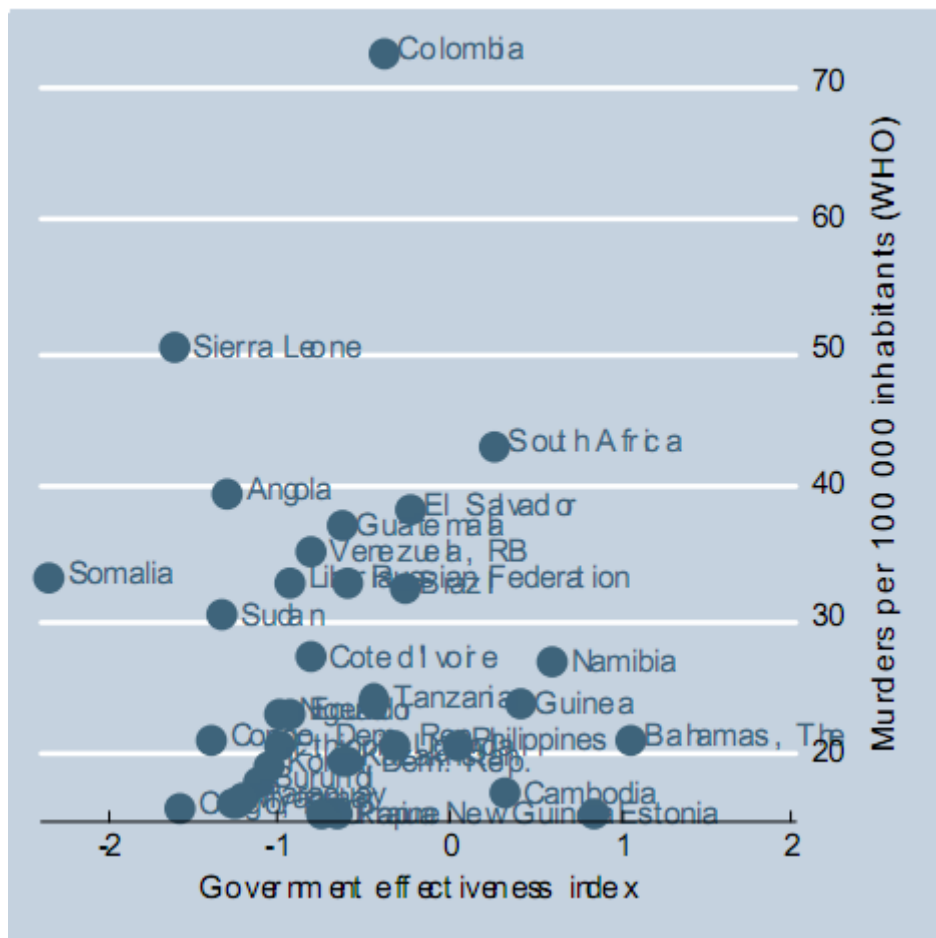


图9 每10万个居民中的谋杀者，2002个国家政府有效性指标（10万个居民中谋杀着为15—75个）

来源：World Bank; WHO.

收入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制度能力的动态性是相一致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制度连续性被打乱，制度能力被削弱，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并且今天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将统计前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殖民状态（加上一些控制数据不同质量的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殖民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收入不平等：殖民化地区的基尼系数比没有殖民化地区高出了13个百分点 (Williamson, 2009)。总体来说，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系数从1491年的22.5%增加到1929年的超过60%（图10b）。另一方面，印度，中国和日本在18和19世纪拥有更加适度的收入分配（图10b, Pomerantz, 2000; Saito, 2009）^①。在中东和北非、东欧、印度和东亚（特别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不平等显著地减少（图10c）。当然，收入不平等问题和软弱的制度能力是同时发生的，而后者可以通过谋杀率来衡量（图11）。

^① 在日本，基尼系数从1860年的34%增加到1940年的56%，在20世纪60-90年代跌到30-40%(Saito,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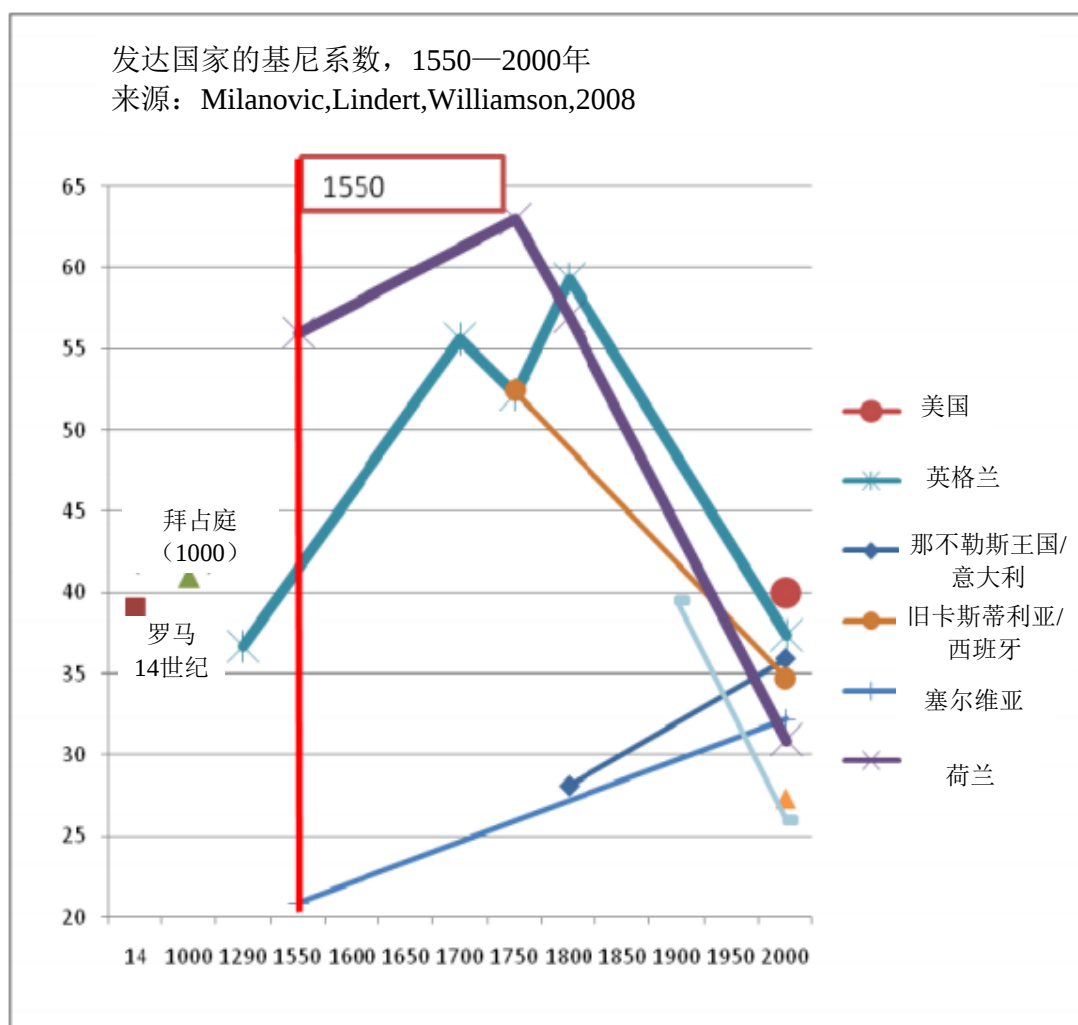


图 10a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1550—2000 年

来源：Milanovic, Lindert, Williamson, 2008.

总的来说，有两种方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1）消除集体主义制度并且承受随之带来的高代价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大众消费为代价允许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储蓄投资率的提高。（2）维持集体主义制度并将收入不平等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直到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率。第一种方法被我们今天称之为西方的国家所采用，它们在 16-18 世纪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西方国家在 19-20 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将这种方法强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身上。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西方化方式试图创造一个制度上的空间—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被摧毁，但新的现代化制度没有生根，这就导致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花费了比之前一些西方国家更大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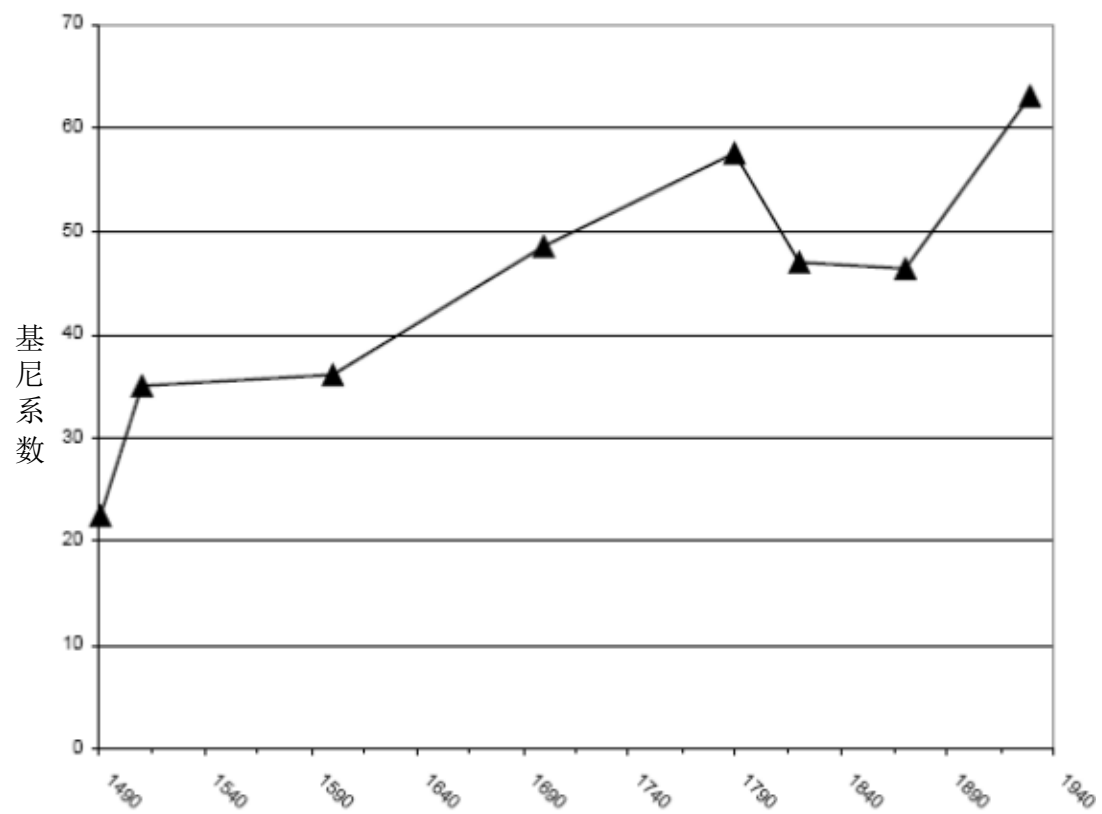


图 10b 拉丁美洲 1491-1929 年收入不平等的估计值^①

来源：Williamson, 2009。

^① 这些不是实际的基尼系数，而是运用之前提到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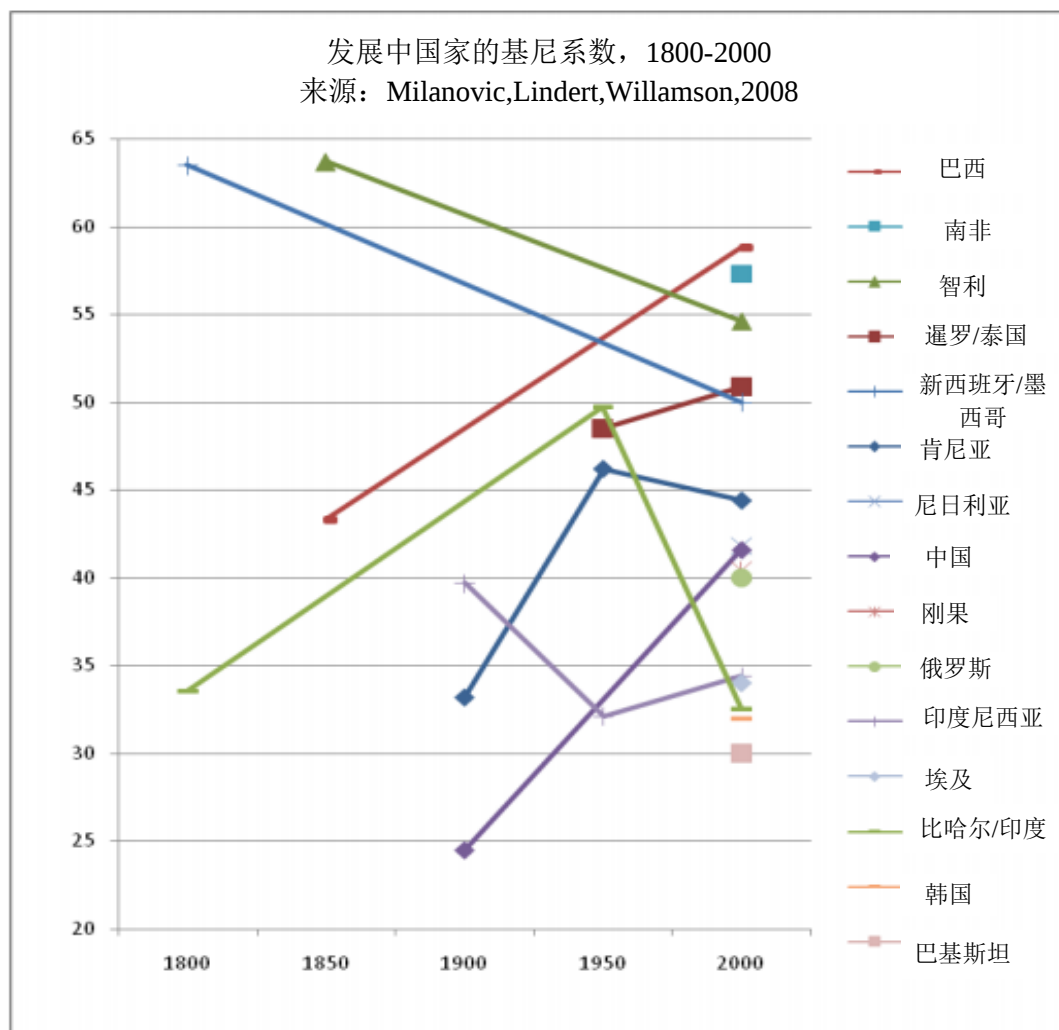


图 10c 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1800-2000 年

来源：Milanovic, Lindert, Williamson, 2008.

另一方面，那些发展中国家成功抵制西方化的制度并保持了制度延续性和相对较低的不平等（东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和印度）虽然它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很高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们处在一个能够利用增长机会的较好位置上。生产率的增加使这些国家能够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出来。其它那些过早地破坏了平等主义制度的国家（复制西方路径）经历了极大的制度能力的下降和不平等的扩大。在印度、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种路径和周期性大规模饥荒有关，周期性大规模饥荒在殖民主义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之所以没发生过，是因为有限的食物在原有的社会机制下是平均分配的。^①

^① “甚至在维多利亚饥荒爆发之前，警告信号也是存在的：C. Walford 在 1878 年声明在英国规则的第一个世纪，饥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之前两千年所有记录在案的饥民的总和。但声明背后冷酷的现实真正曝光（这个我也不太懂）。根据最可靠的估计，1876-1878 年由于饥荒造成的死亡在 6-8 百万之间，在 1896-1897 年和 1899-1900 年两次饥荒中，死亡总数可能达到了 1700 万到 2000 万。由此看来，四分之一世纪达到了殖民统治良好治理的顶峰。饥荒造成的死亡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Chibber, 2005）。在中国，1644-1795 年这一数据是 8000，1796-1871 年是 57000，1871-1911 年是 325000，1911-1947 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是 58300。1876-1879 年饥荒导致了至少一千万人的死亡，这一数字是自 1644 年以来所有死亡人数的两倍（夏明方教授根据 Pomerantz, 2006 计算得出）。在更加发达的拉美国家，20 世纪的增长率水平并没有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缩小（阿根廷，世界大战期间是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再是发达国家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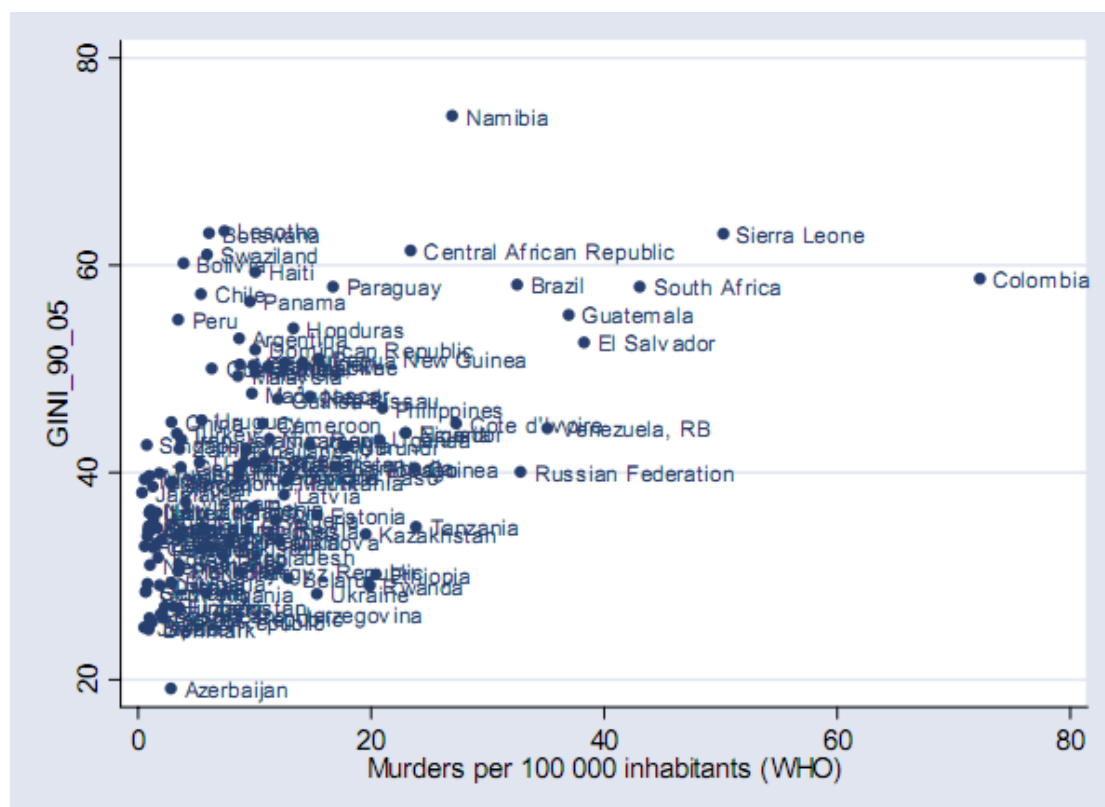


图 11 2002 年的谋杀率和 1990-2005 年的收入不平等

来源：WHO, WDI.

简而言之，过早废除集体主义制度即使能够克服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不能带来健康的增长。“不平等能提高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相反地，极大的经济不平等总是与极度集中的政治权利相关，并且这种权利总是通过寻租行为和租金保持来扩大收入差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明显地减慢了经济的增长”（Milanovic, Lidert, and Williamson, 2008）。

四、中国的制度延续性

正式说来中国不是一个被殖民化的国家，尽管在鸦片战争后的 18 世纪中期沦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长达一个世纪。然而，在 19 世纪的开端，中国无疑是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下最成功的国家——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被人口的加速增长全部“耗尽”，所以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人均 GDP 的上升，但是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 18 世纪的平均 22%-26% 上升到 37%（图 11）。用工业化前的世界标准来看，这是一个真实的非凡成就。

换一种方式，中国在马尔萨斯增长体制内是非常成功的：人口上升到达一个 1-1.5 亿的上限就回落。然而到 1800 年，人口增长到了接近 400 百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世界人口里程碑”——Sugihara 的观点——“这对于世界 GDP 的影响比工业革命给英国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英国在 1820 年占世界 GDP 的比重少于 6%。”（Arrighi, 2007）。那时世界在走向一个总人口中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比例是 1:1 的总体均衡。和西欧国家的比较是非常生动的：在 0-1500 年期间，中国人口是西欧国家人口的三倍，到 1820 年，中国人口是西欧国家的四倍（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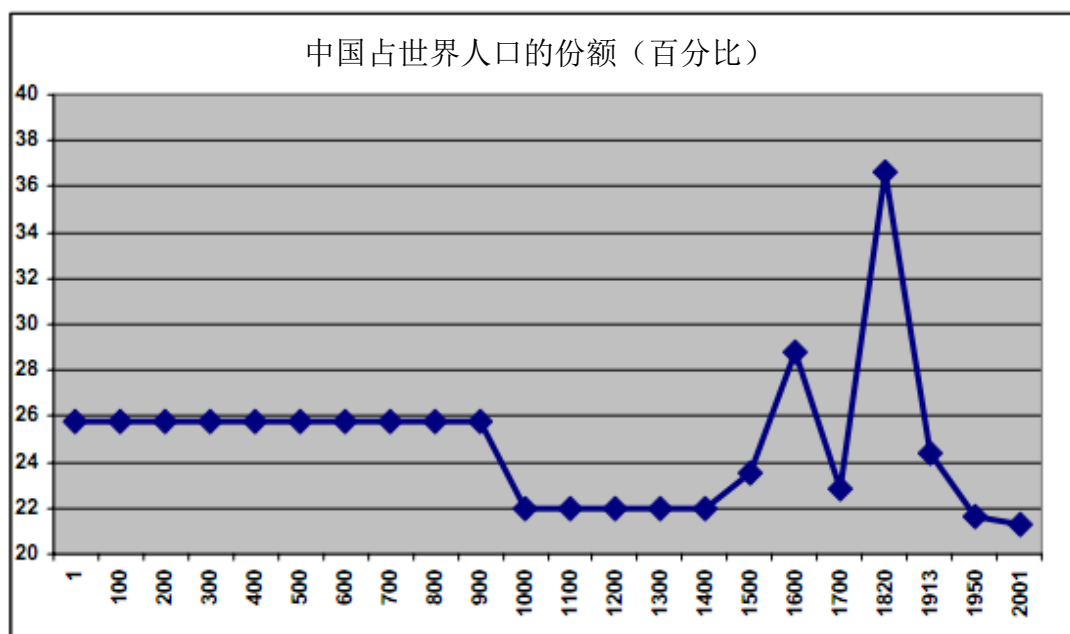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份额（百分比）

来源：Maddison, 2008.

19 世纪早期，尽管生产率已经比西方国家低了两倍，但中国仍然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世界三分之一的 GDP 和工业产出。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自给自足的中心，对与外来世界的“蛮夷”发展联系不感兴趣。“永矢恭顺”——这是统治了 18 世纪大部分（1736 年-1796 年）的中国乾隆皇帝在 1772 年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关于贸易合作提案的著名回复中的结束语。

然而，问题在于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西方世界的生产率增长速率增加，马尔萨斯增长体制走向终结。军事实力现在更多的是由技术而不是人口规模决定，所以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的结果是预设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1840-1842 年和 1856-1860 年）经历了一次羞辱性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有关全球化的条款。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 世纪早期约为美国水平的一半，到 1950 年只有美国 5% 的水平（图 13）；同一时期中国和西欧国家的这一比例从 2：1 下降到 1：5（图 14）。

可是随后的中国发展道路和其它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作为前工业时代面积最大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较好地保持了传统制度的延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被错误地认为是传统国家。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它一个国家都更好地保持了传统价值观的延续性。^①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大突破：中国共产党临时性的抵制外国影响（1949 年到 1979 年）使得传统制度得以加强，发展能够继续沿着“奉天承运”的轨迹进行。

^① 中国只有两次被外来入侵者征服——一次是在 12 世纪被蒙古人征服（蒙古人后来建立了元朝——1279-1368 年），一次是被满族人征服（满人后来建立了清朝——1644-1911 年），但在这两次事件中，胜利者们迅速被“中国化”，被强有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汉学研究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使中国非常特别：许多国家发端于象形文化（字符），但只有更大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包括在内）在整个历史中保持了这种文化；古抄本的数量和关于古代历史的真实信息的数量至少比世界上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祖先受到尊重，儒家价值观盛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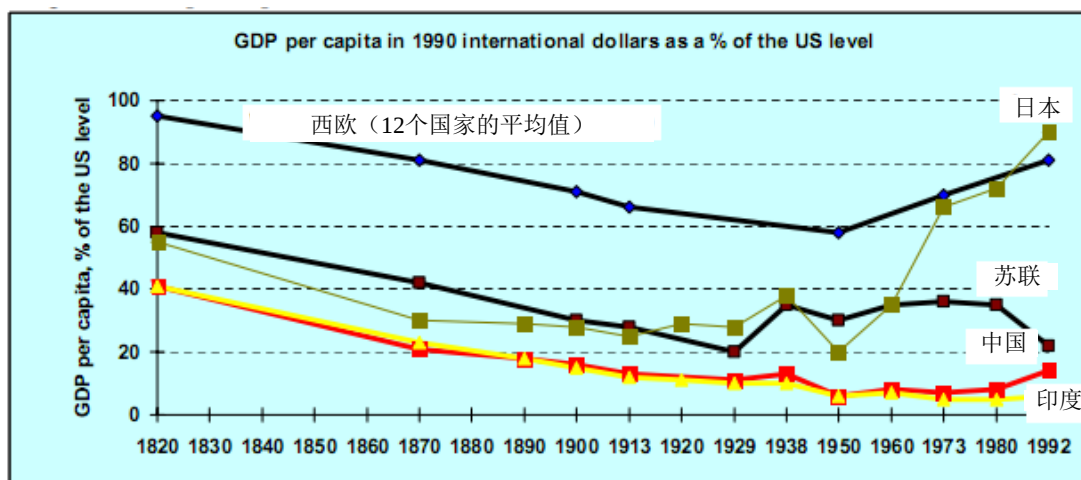


图 13 1990 年的人均 GDP 占美国的比重 (单位: 国际元)

来源: Maddison,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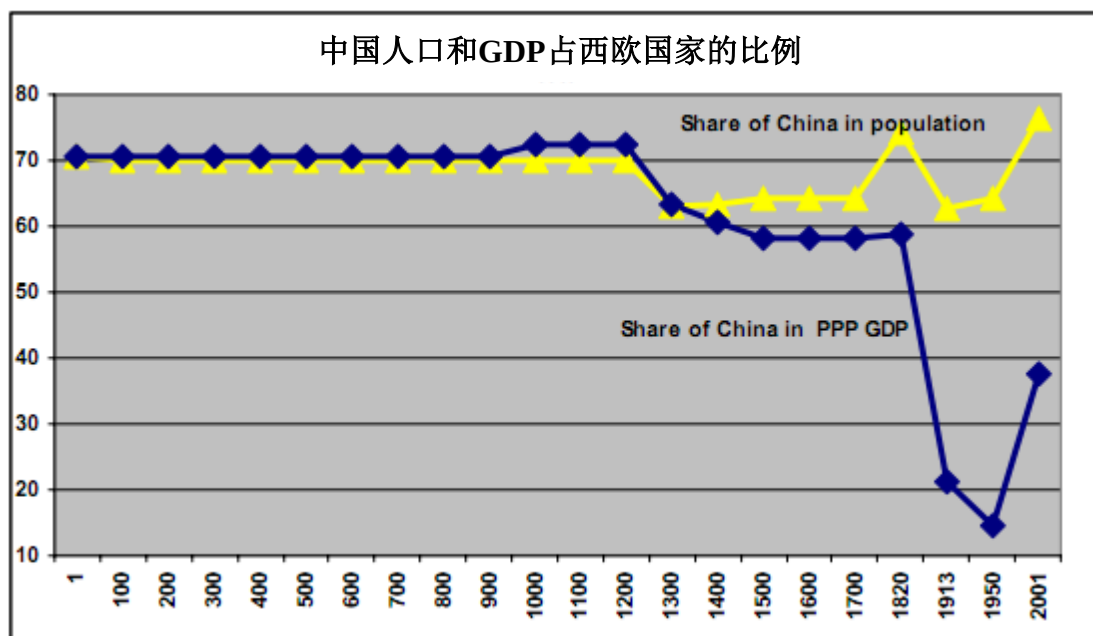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人口和 GDP 占西欧国家的比例

来源: Maddison, 2005.

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先例: 早期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五个国家或地区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在没有牺牲掉它们的传统价值观的条件下成功赶上了西方。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成功追赶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之前的追赶案例普遍被西方国家支持, 有时甚至被称为“邀请发展”, 中国崛起的发生并不是被任何国家“邀请”的。其次是因为, 中国的成功追赶由于这个国家的庞大规模不能被解释成为特别的和例外的。中国的追赶如果成功, 将会成为关于制度延续性优势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20 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的增长比较

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的赶超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在改革开放以后 (1979 年以来) 比世界其它国家要高,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 (1949-1979 年) 也高于世界其

它国家,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增长率有暂时性的下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根据 Maddison (2008)的观点,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50 年是印度的 70%, 1958-1959 年是印度的 100%, 大跃进期间有所下降,在 1966 年又上升到与印度相同的水平,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有所下跌,在 1978 年又再一次上升到与印度相同的水平。到 2006 年为止,中国的人均 GDP 是印度人均 GDP 的三倍多。

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从 1960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五年移动平均值)总是比印度的要高(图 15),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印度的一半,而今天确实是印度的三倍多(图 16)。1950 年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就上升到了 65 岁——比印度高出了 13 岁(图 17);如今中国的预期寿命是 73 岁——比印度和俄罗斯高出了 7 岁。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 年以来)还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 年以来)都是非常成功。尽管这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苏维埃赶超发展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主要的并且成功地赶上了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图 13,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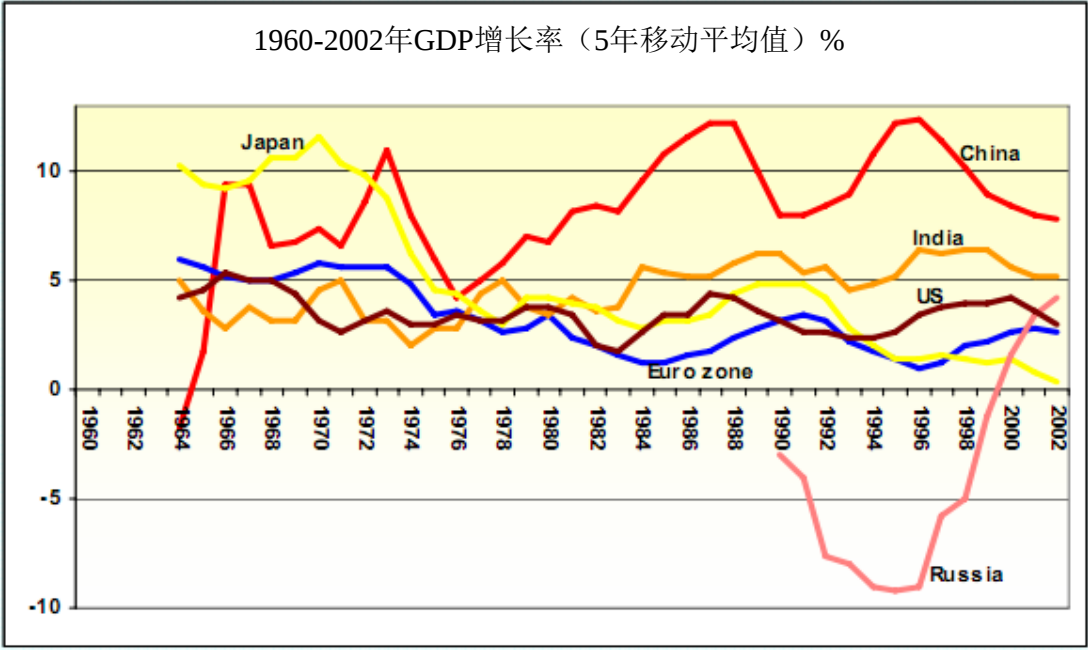


图 15 1960-2002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 GDP 的增长率 (5 年移动平均值), %
来源: W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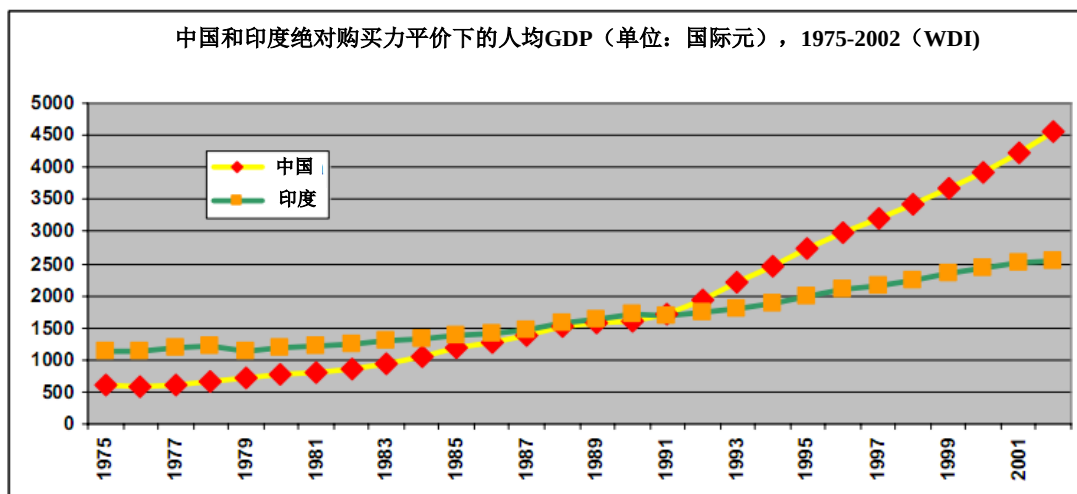


图 16 中国和印度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 GDP（单位：国际元），1975-2002（WDI）

来源：W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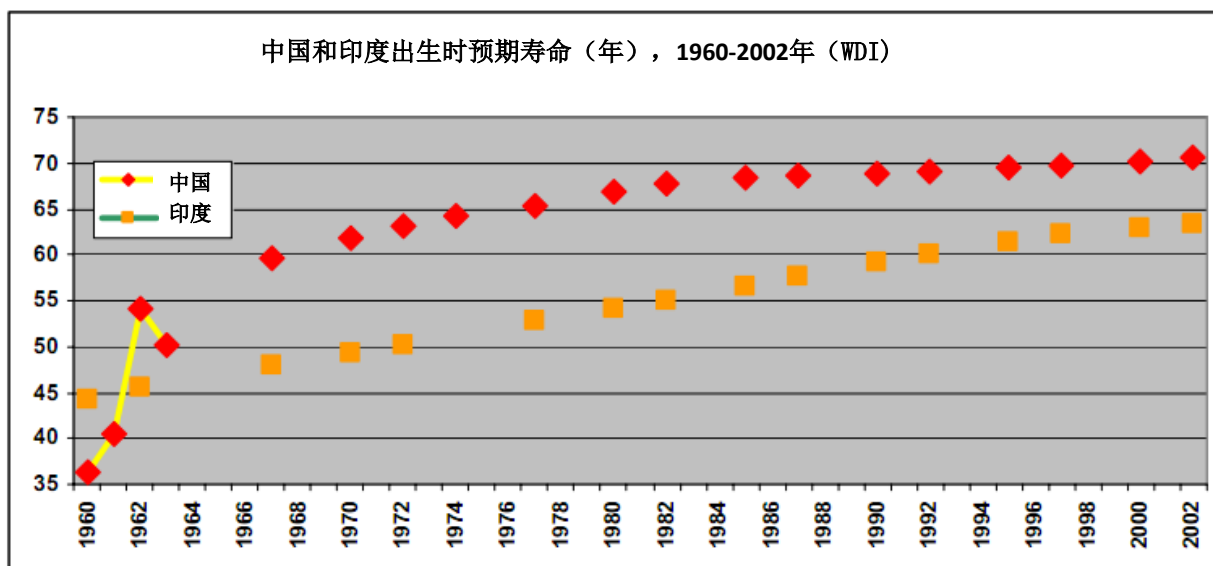


图 17 出生时预期寿命，年，中国和印度，1960-2002 年

来源：W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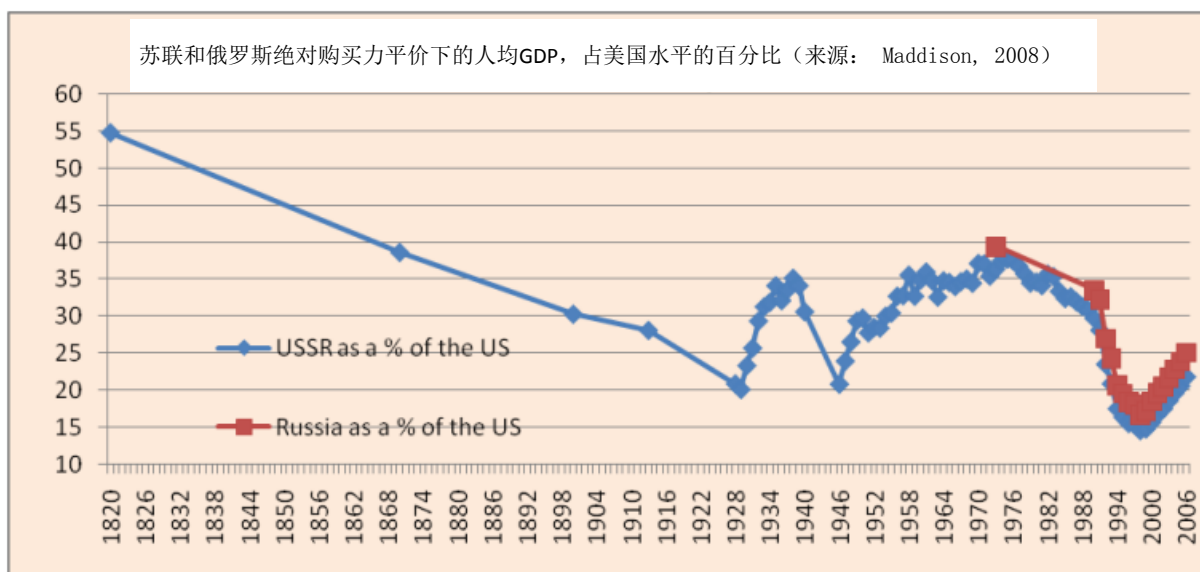


图 18 苏联和俄罗斯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 GDP 占美国水平的百分比

来源：Maddison, 2008.

前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大速率不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每年 3%），而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在几十年间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每年 0.6% 增加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8%，随后单调递减，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负增长率（表 1）。20 世纪 50 年代是前苏联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图 19）。前苏联 20 世纪 50 年代的增长模式和日本 20 世纪 50-70 年代、韩国和台湾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增长模式很相似——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平衡掉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性地提高（表 1）。可是，苏联的高速经济增长只维持了十年，东亚维持了 30-40 年，从而推进了日本、南韩和台湾迈入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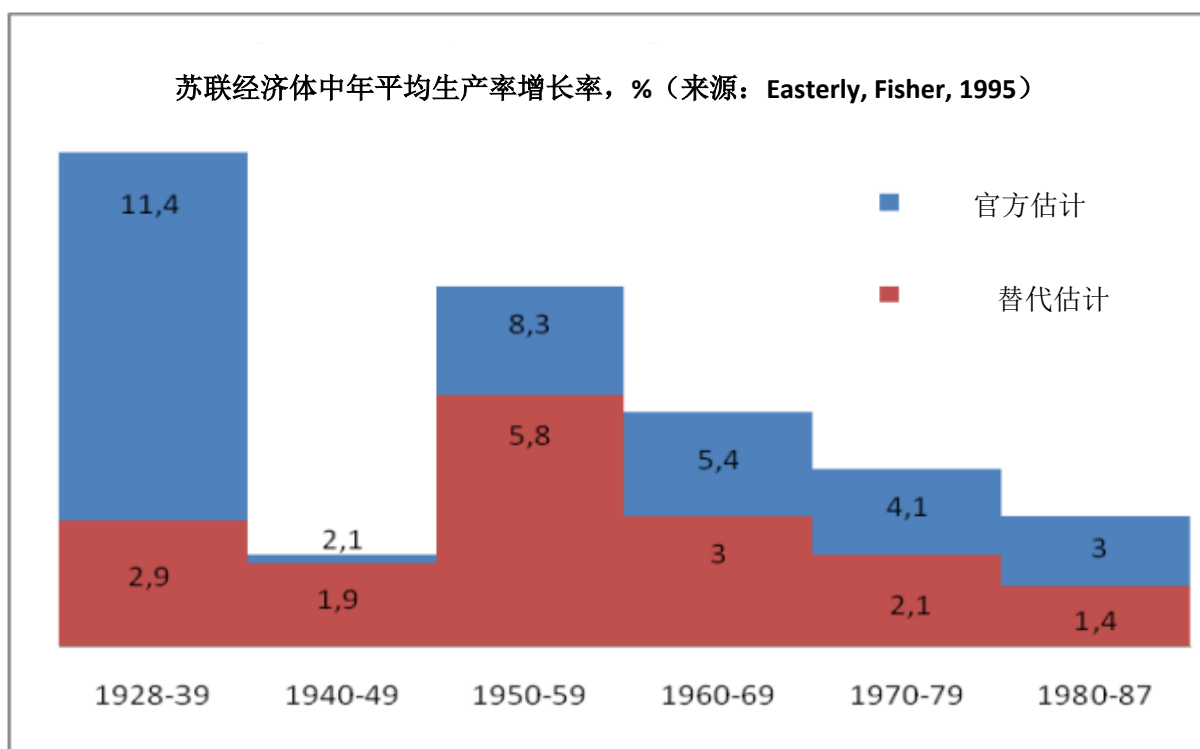


图 19 苏联经济体中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率，%

来源：Easterly, Fisher, 1995.

表 1 苏联和亚洲经济的增长率，西方数据，1928-87（年平均，%）

时期/国家	每工人产出	每工人资本	资本/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单位替代弹性）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假设替代弹性为 0.4）
苏联（1928-39）	2.9	5.7	2.8	0.6	
苏联（1940-49）	1.9	1.5	-0.4	1.3	
苏联（1950-59）	5.8	7.4	1.6	2.8	1.1
苏联（1960-69）	3.0	5.4	2.4	0.8	1.1
苏联（1970-79）	2.1	5.0	2.9	0.1	1.2
苏联（1980-87）	1.4	4.0	2.6	-0.2	1.1
日本（1950/57/65-85/88/90）			2.3-3.2	1.7-2.5	
韩国（1950/60/65-85/88/90）			2.8—3.7	1.7-2.8	
台湾（1950/53/65-85/88/90）			2.6—3.1	1.9-2.4	

来源：Easterly, Fisher, 1995.

20 世纪 60-80 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诸多原因中，中央计划经济不能保证足够多的投资用来替换退休的固定资本是最为关键的原因（Popov, 2007c）。更新实物资本的任务和完成计划指标的短期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苏联中央计划者更偏好投资新的资本而不是更新旧的资本。因此，在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巨大投资（“大推动”）之后，在经过与资本存量的使用寿命（大约 20 年）相等的年份后即在需要大规模替换掉退休资本以前，达到了最高的生产率水平。然后，资本开始老化，急剧地减少资本生产率，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经历了由“大推动”所带来的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注定要进入增长减速。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相对较短的经历（1949/59-79）比苏联过长的经历（1929-1991 年）要优越。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如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应该会更加成功。

选择在正确的时间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实现成功赶超发展的充分条件。制造业的增长就像是烹饪一盘好的菜肴——所有必不可少的原料都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如果有一种加多了或者放少了，“增长的化学效应”就不会发生。快速的经济增长只有当一些必要的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具体地说，快速的增长需要一些关键的投入——基

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甚至农业国家的土地分配、强大的国家机构以及经济刺激。一旦这些必备要素中的一个条件不具备，经济就不会腾飞。Rodrik, Hausmann 和 Velasco (2005)认为“绑定约束”阻碍经济增长；发现这些约束是“增长诊断”的一个任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约束和市场自由化、国家能力、人力资本或者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能够奏效，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却不能呢？根据列出的方法得到的答案是中欧缺少的因素是经济自由化，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少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市场自由化。为什么自由化在中欧和中国奏效，但是在独联体国家却没有奏效呢？这是因为独联体国家的自由化的实施是以破坏国家能力的方式进行的一一这些事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宝贵的遗产——而在中欧和中国，过渡期间国家能力是没有大幅减弱的。

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中国的案例，我们会认识到改革之后时期内的迅速赶超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甚至并不是十分依赖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前提条件大多是在先前的 1949-1976 年这段时期创造的。实际上，没有毛泽东政权的伟大成就，1979 年及以后的市场改革不会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9 年及以后的经济自由化只是最后一个促进因素。其它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和人力资本。而这在之前的制度中已经具备。没有这些因素而仅仅靠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成功过，有时还会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适得其反。

中国 1979 年及以后的市场类型改革带来经济加速增长是因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高效的政府，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① (Lu, 1999)。通过每个村的党组织，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规章制度，这比秦始皇以来包括国民党 (1912-1949 年) 在内的所有政权都更高效。19 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只有 GDP 的 3%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 12%)，国民党执政后增加到 5%，毛泽东政府留给邓小平改革团队的国库中收入是 GDP 的 20%。中国的犯罪率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世界最低水平，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影子经济，由透明经济组织评估的中国的腐败甚至在 1985 年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在同一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关于大众教育的最伟大的实验”期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 1984 年报告)，中国人的识字率从 1949 年的 28% 提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 65% (印度为 41%)。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描述成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错误。事实上，中国国内产出在整个解放时期下降了三次：在 1960-62 年，下降超过 30%，在 1967-68 年下降 10%，在 1976 年，下降 2% (WDI, 2005)。大跃进导致了饥荒和人口减少。但是，如果这些重大挫折可以避免的话，中国 1949-79 年的发展会更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研究人员可能会同意，按它没有遵循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固有属性这点来看，造成最重大伤害的大跃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无法确定“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被排除在“一揽子”后续政策之外——这次群众运动非常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并且很可能阻止不可避免的政府机构官僚化的发生，这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②。但重点是即使没有排除这些阶段，中国在 1949 年至 1979 年的发展也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好很多，而且这个时期的发展也为以后改革时期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① 这对印度来说是真实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类型改革产生好结果是因为他们是以进口替代时期的成就为基础的 (Nayyar, 2006)。

^② 1976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的病情变得更严重时，他叫来华国锋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人民网，2003)。

换个说法，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实际上具备了除市场自由化以外的所有增长必要因素——市场自由化是一个比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更加容易产生的因素。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经济自由化任务需要精细化管理。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底中后期也有着类似的处境。事实上，苏维埃政府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增产率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直减少，预期寿命也没有增长，并且犯罪率慢慢增加，但普遍强大的机构和巨大的人力资本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初始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化在中国（1979 年起）、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1989 年至今）产生了显著不同的结果（Popov, 2000 年，2007a）。

与 1991 年后的俄罗斯不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 1979-2009 年较好的维护了其强大的国家制度——中国的谋杀率仍然低于每 10 万居民 3 个的水平，相比俄罗斯 2002 年约 30 个，在 2008 年约 20（Popov, 2007d）。事实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毛泽东政权下，山东省的谋杀率小于 1（山东省，2005 年），1987 年，整个中国的谋杀率估计为 1.5（WHO, 1994）。市场改革时期谋杀率三倍的增长可以与俄罗斯的增长水平相比较，尽管中国的水平没有哪一方面和俄罗斯接近。

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期间保持了相对强大的国家制度，而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却崩溃了呢？部分原因在于体系质量的民主化影响：就像在以前的论文中（Polterovich and Popov, 2007; Polterovich, Popov, and Tonis, 2007, 2008; Zakaria, 1997）所讨论到的，民主化如果在一个较差的法律环境中（疲软的国家制度）推进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制度的进一步弱化和宏观政策的恶化。而宏观经济政策的恶化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还会阻碍稳定的民主政权的建立。

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在民主政权下有一些快速赶超发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和博茨瓦纳、20 世纪 60 年代获得独立后的毛里求斯）。此外，专制政体下的国家制度之间质量的区别也是很大的——改革前的中国每 10 万居民中的谋杀者少于 1 个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了 20 个。另一个最重要的解释也许在于中国和俄罗斯制度的长期发展轨道。中国 1949 年的解放类似于 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在革命后在这两个国家都开始执政，也因为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在被先前的西方化制度摧毁后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更加强大。可是，在俄国 1917-1991 年的社会主义政权只是打断了至少从 17 世纪就开始的西方制度的移植进程，而在中国，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只是把中国带回到长期制度上的轨道上来，因为这一发展轨道在鸦片战争以后被短暂地（并且仅仅是部分的）打乱。

换种方式来说，俄罗斯在 1917 年以前就已经被西方化，1917 年革命所产生的集体主义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前长期的制度发展不相容。另一方面，中国西方化的尝试失败（1940-1949）之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制度（亚洲价值观）^①。集体主义制度在俄罗斯只是一段插曲，是对大趋势的偏离。但是在中国则是主流发展的回归，是长期趋势的恢复。因此，从 1979 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尽管引起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谋杀率和犯罪率的上升，但至少直到今天为止没有带来制度崩溃。

然而，中国看似完美的发展轨迹存在一个主要的威胁——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图 20），经济改革的前几年（1979-1985 年）并没有这个问题，不平等问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日本和南韩，甚至超过俄罗斯达到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水平。

^① “价值观”的延续和恢复同样体现在革命承诺上：每一个男人，无论多么贫穷，都能成为户主并且能传宗接代（彭慕兰，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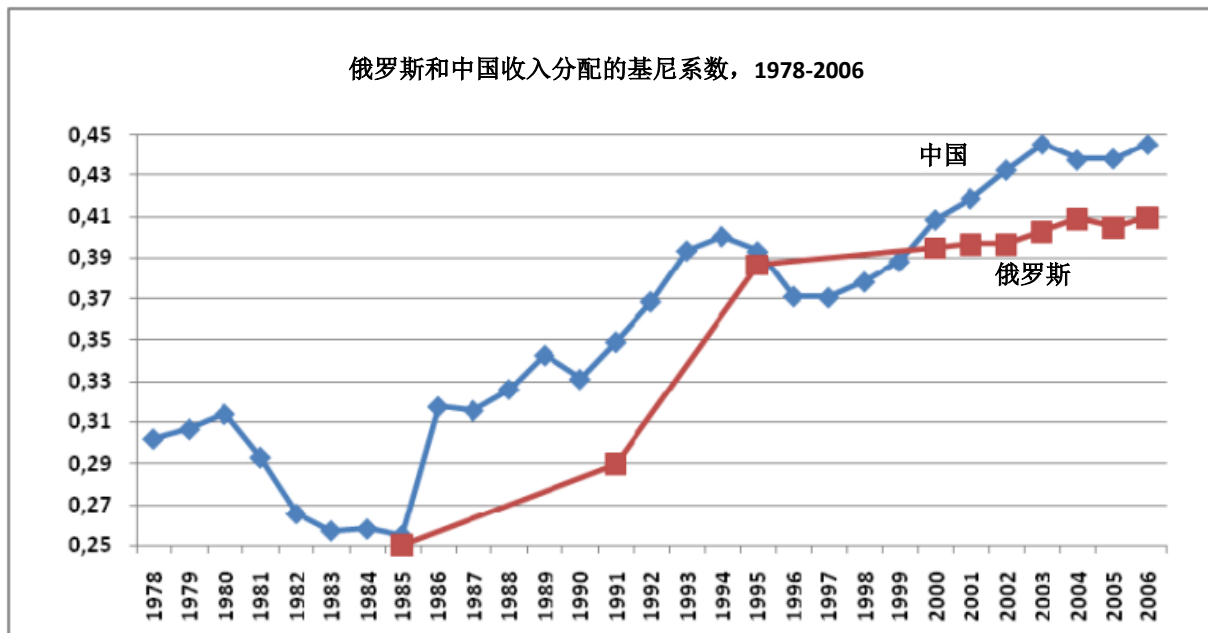


图 20 俄罗斯和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78-2006

来源：Chen, Hou, Jin, 2008; Goskomstat

中国亿万富豪的数目也增长很快：在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之前，根据 2007 年 4 月发布的福布斯排行榜，中国有 20 个亿万富翁（图 21）；到 2008 年 4 月股票价格崩盘之前，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40。这仍然低于俄罗斯的水平（2007 年是 53 个，2008 年是 87 个），但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中国也许能复制俄罗斯“国家的私有化”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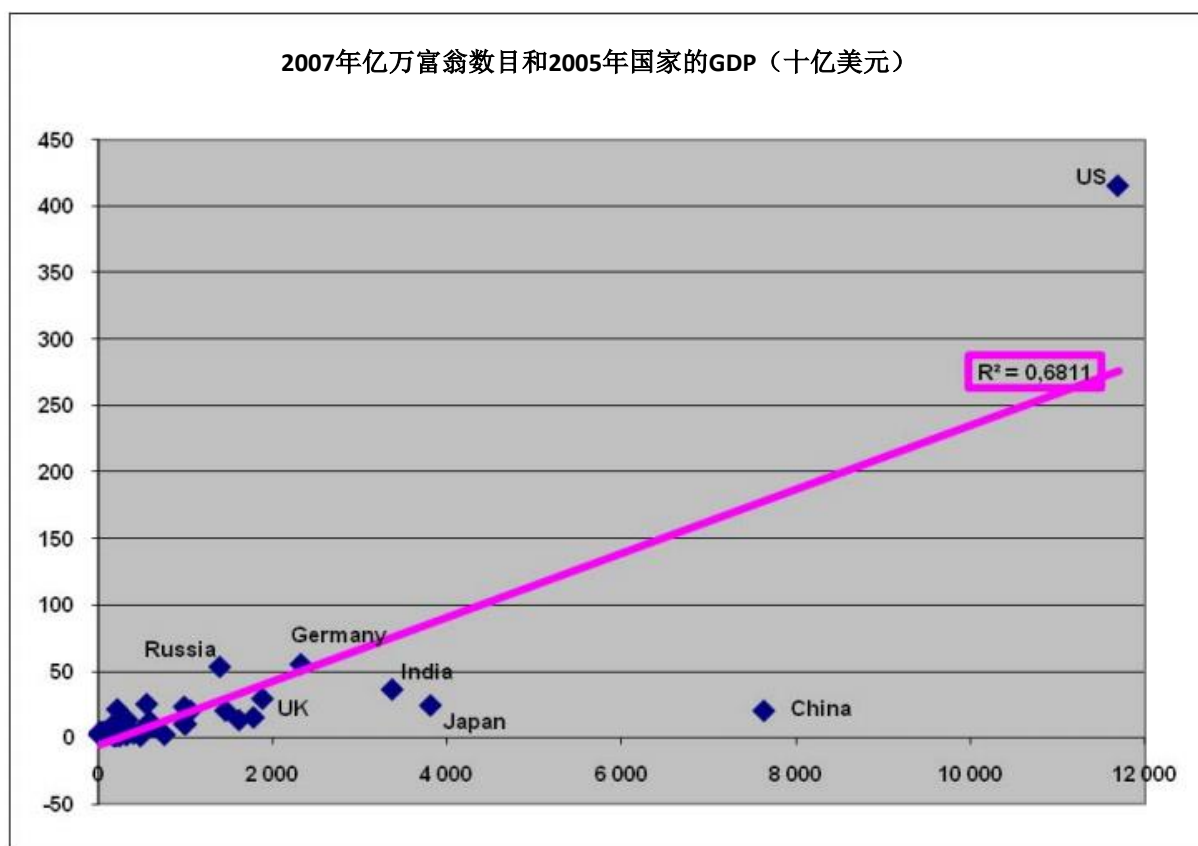


图 21 2007 年亿万富翁数目和 2005 年国家的 GDP（十亿美元）

来源：Forbes billionaire list (www.Forbes.com).

六、结论

从更长期的千年视角来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19 世纪中期）和解放（1949 年）之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由于制度的连续性——在不打破传统集体主义结构（亚洲价值观）的条件下沿着原有的发展路径发展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著名的改革策略深深的根植于中国千年的古老传统中而且代表了这种制度的连续性。

千年视角下的中国成功不仅仅局限在其近期（1949 年以来）人均 GDP 的奋起直追。中国的成功也在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人均 GDP 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时候（1550-1950 年）也能够保持其原有的状态和地位的能力。从整体的标准来看（GDP 总量），今天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个，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发现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种痛苦更少的方法。西方国家在较低的发展阶段（16 到 18 世纪）就打破了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经历了偏向富人的痛苦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日益扩大）。这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即 K/L 比率和生产率提高，但所付出的代价是高度的收入不均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恶化和低收入水平下的死亡率上升。中国比西方多维持了 500 年传统的制度和较低的收入不平衡，直到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在没有引起大范围剥削人民的条件下得到提高。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改革在中国（1979 年以来）成功了，但在其他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却失败了？本文和一些其他的文献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给出了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的改革与“华盛顿共识”有很大出入（逐渐而不是立即解除价格管制，没有大规模私有化，强调工业的政策，通过积累外汇使汇率低估，见 Polterovich 和

Popov, 2004, 2005, 2006)。其次, 近期中国的成功(1979 年以来)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 年)的成就之上的: 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高效的政府、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Popov, 2007)。再次, 与前苏联不同,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付诸东流, 因为中国所采取的是渐进的而不是休克式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Popov, 2007; Polterovich and Popov, 2007)。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直到今天, 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脱离集中主义制度, 这使得低收入和财富不均的状况得以维持; 短暂的西方化尝试(1940-1949 年)最终破产。另一方面, 主动或者被动(被殖民)地移植西方制度(拉丁美洲, 前苏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选择仿照西方的模式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最终以高度收入不均衡和制度能力的明显缺乏而告终。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成功的追赶式发展如果继续下去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这并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国家规模, 而且是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世界大国中的成功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内生的、非西方模式的经济模型之上的。如果这一解释正确的话, 下一个成功的追赶式发展的区域将是中东和北非地区中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和南亚(印度), 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将会落后于他们。

(朱美威翻译, 朱美威、张建清校对)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aper. July.
2.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Grow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XV, 1167-1199.
3.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Arrighi, Giovanni, 2008.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5. Brenner, Robert and Christopher Isett, 2002.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pp. 609-662.
6. Bryant, Joseph M. 2006. *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 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1(4).
7.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Chang, Ha-Joon, 2007. *State Owned Enterprise Reform*. UN DESA Policy Note, http://esa.un.org/techcoop/documents/PN_SOERreformNote.pdf.
9. Chen, Jiandong, Wenxuan Hou, Shenwu Jin, 2008.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on Income Disparity in a Dual Society: Evidence from China*. 2008 Chinese (UK)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t Cambridge, UK

and the 2008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at Chengdu, China.

10. Chibber, Vivek, 2005. “*The Good Empire – Should we pick up where the British left off?*”, Boston Review, February/March .

11. Clark, Gregory ,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2. Dimond, Jared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W. Norton.

13. Easterly, W., Fisher, S. 1995. *The Soviet Economic Declin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3, pp. 341-71.

14. Eisner, Manuel, 2003.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5. Faye, Michael L., John W. McArthur, Jeffrey Sachs, and Thomas Snow, 2004. “*The Challenges Facing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5, No. 1, March.

16. Galor, Oded, 1998. *Economic Growth in the Very Long-Run*. Prepared for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 2nd edition (S. Duraluf and L. Blume, eds.)

17. Galor, Oded, D. Weil,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06-828, September.

18. Galor, Oded and Omer Moav, 2005.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Life Expectancy*. August 24, 2004 , <http://129.3.20.41/eps/ge/papers/0409/0409004.pdf>.

20. Goldstone Jack A. 2007.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Gregory Clark’s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World Economics, Vol. 8, No. 3, July– September.

21. Hausmann, Ricardo, Jason Hwang, and Dani Rodrik, 2006.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NBER Working Paper, January.

22. Landes, David, 1998.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Are Some So Rich and Others So Poor?* New York, W.W. Norton.

23. Lu, Aiguo, 1999.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ince 184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5. Maddison, Agn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26. Maddison, Agnus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 Published by th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27. Maddison, Agnus ,2003.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28. Maddison, Agnus ,2004. *Under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Palgrave Macmillan.

29. Maddison, A. 2008.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6 AD* .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9-2008.xls.
30. Milanovic, Branko, Peter H. Lindert, Jeffrey G. Williamson ,2008. *Pre-Industrial Inequality: An Early Conjectural Map*. Mimeo, August 23, 2007.
http://www.economics.harvard.edu/faculty/williamson/files/Pre-industrial_inequality.pdf.
31. Mokyr, Joel , 2002.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2. Nayyar, Deepak, 2006. *INDIA'S UNFINISHED JOURNEY. Transforming Growth into Developm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ume 40, Number 3, July.
33. Naughton, Barry, 1997.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Macroeconomic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 In: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Europe, Asia and North Korea*. Ed. by D. Lee.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Seoul.
34. People's Web, 2003. "Today in History: Mao Zedong Said: I Did 2 Things in My Life". June 15, 2003.
<http://www.people.com.cn/GB/tupian/1097/1914967.html>. In Chinese.
35. Polterovich, V. 2001. *Transplanta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Economic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3, p.24-50, in Russian [PDF, 303 K] (Полтерович В.М. Трансплан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2001. № 3).
36. Polterovich, V., V. Popov , 2004.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In: *Slavic Eura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Ed. By S. Tabata and A. Iwashita.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
<http://www.nes.ru/%7Evpopov/documents/EXCHANGE%20RATE-GrowthDEC2002withcharts.pdf>.
37. Polterovich, V., Popov, V. 2005. *Appropriate Economic Polic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NES.
<http://www.nes.ru/english/research/pdf/2005/PopovPolterovich.pdf>.
38. Polterovich, V., Popov, V. 2006. *Stag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Policies and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Annual Glob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January.
<http://http-server.carleton.ca/~vpopov/documents/NewWorldEconomicOrder.pdf>.
39. Polterovich, V., Popov, V. 2007. *Democratization,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Failed Expectations and Renewed Hopes*. Edited by Natalia Dinello and Vladimir Popov,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0. Polterovich, V., Popov, V. and Tonis, A. 2007. *Resource abundance,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instability of*

democracy. NES Working Paper # WP2007/73.

<http://www.nes.ru/russian/research/pdf/2007/PolterPopovTonisIns.pdf>.

41. Polterovich, V., Popov, V. and Tonis, A., 2008. *Mechanisms of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NES Working Paper # WP/2008/082 . http://www.nes.ru/english/research/pdf/2008/Polterivich_Popov.pdf.

42. Pomeranz, Kenneth ,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3. Pomeranz, Kenneth , 2006. *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52, No. 1, March.

44. Popov, V. 2000.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Explain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42, No. 1, Spring, pp. 1-57 .

<http://www.nes.ru/%7Evpopov/documents/TR-REC-full.pdf>.

45. Popov, V. 2007a.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Medium term perspective*. TIGER working paper No. 99, Warsaw, February. Published subsequently in: *História e Economia Revista Interdisciplinar*, Vol. 3 - n. 1 - 2 semestre .

46. Popov, V. 2007b.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Reconsidered: 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15 Years of Reform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49, Issue 1, March, pp. 1-31.

<http://www.nes.ru/%7Evpopov/documents/Shock%20vs%20grad%20reconsidered%20-15%20years%20after%20-article.pdf>.

47. Popov, V. 2007c. *Life Cycle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hy Soviet Growth Rates Peaked in the 1950s*. In: *Transition and Beyond*. Edited by: Saul Estrin, Grzegorz W. Kolodko and Milica Uvalic. Palgrave Macmillan.

48. Popov, V. 2007d. *Russia Redux*. New Left Review, No. 44, march-April.

49. Rodrik, Dani, 2004. *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 CESifo. Journal for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Vol. 2, No. 4, Summer.

50. Rodrik, Dani, R. Hausmann, A. Velasco, 2005. *Growth Diagnostics*.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barcelonafinalmarch2005.pdf>.

51. Rodrik, Dani,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 , 2002.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ctober.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academic.ksg/institutionsrule,%205.0.pdf>.

52. O'Rourke, K. H. and R. Sinnott, 2001. *The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Survey Evidence, Trinity College Dublin Economic Papers 200110, Trinity College Dublin Economics Department.

53. O'Rourke, Kevin H. & Jeffrey G. Williamson, 2002. *From Malthus to Ohlin: Trad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Since 1500*, NBER Working Papers 8955.

54. Sachs, Jeffrey D. 1996.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ison of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Mimeo. Cambridge, M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5. Sachs, Jeffrey, 2003. *Institutions Matter, but Not for Everything. The role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in development shouldn't be underestimated*.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No. 38.

56. Sachs, Jeffrey D. and Andrew M. Warner, 1995.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5398.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57. Sachs, Jeffrey D. and Andrew M. Warner, 1997a.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ed ver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58. Sachs, Jeffrey D. and Andrew M. Warner, 1997b. *Sources of slow growth in African economie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 6(3), 335-380.

59. Sachs, J.D. and A.M. Warner, 1999. *The big push, 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59, 43-76.

60. Sachs, Jeffrey D., Andrew M. Warner, 2001.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pp. 827-838.

61. Saito, Osamu, 1996. *Historical Demography: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0, No. 3 (Nov.), pp. 537-553.

62. Saito, O. 2006. "Pre-Transition Fertility in Asia: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 pp. 1-17.

63. Saito, O. 2009. *Income Growth and Inequality Over the Very Long Run: England, India and Japan Compar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ajor Regional Powers in Eurasia. July 10.

64. Shandong, 2009. *Shandong Province data base* [Shandong sheng shengqing ziliaoku].

<http://www.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chword=&K=a&A=16&rec=42&run=13>.

http://bbs.tiexue.net/post_1207004_1.html.

65. Solow, Robert M. 2007.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Review of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Gregory Cla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4, Number 18, November 17.

66. Turchin, Peter , 2005. *War and Peace and War: The Life Cycles of Imperial Nations*. Pi Press.
67. WDI, 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68. WHO, 1994. *WHO Health for All Database*, 2004.
69. Wen, Guanzhong James, 2008. *Why Was China Trapped in an Agrarian Society--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Needham Puzzle*. Mimeo. Trinity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70. Williamson, Jeffrey G. 2002. *Winners and Losers over Two Centuries of Globalization*. WIDER Annual lecture 6. WIDER/UNU, November.
71. Williamson, Jeffrey G. 2009. *History Without Evidence: Latin American Inequality since 1491*.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Discussion paper No. 3.
72. Wong, Roy Bin, 1997.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3. Wringley, E. A. and R.S.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 – 1871. A Reconstruc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74. Zakaria, F. 1997.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6, November/December, pp. 22.